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唐君毅與牟宗三對朱子學詮釋之比較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32-002-

執行期間：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高柏園

計畫參與人員：羅雅純、陳雀倩、魏明政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唐君毅與牟宗三對朱子學詮釋之比較研究

個別型計畫，NSC 91 - 2411 - H - 032 - 002

計畫主持人：高柏園

計畫參與人：羅雅純、陳雀倩、魏明政

執行期間：91 年 08 月 01 日 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字

（一）摘要

唐君毅與牟宗三二位先生是當代新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整個當代新儒學的主要內容及理論基礎，皆是以唐、牟為典範加以發展。另一方面，朱子是宋明理學發展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他不但綜合了北宋理學的發展，也開出南宋理學以至明代理學的主要規模。問題的焦點是：朱子為核心的宋明理學乃是當代新儒家理論發展的重要淵源，然而當代新儒家的二位大師對朱子的理解與詮釋卻並不一致。果如此，則至少有以下二個問題值得注意：首先，我們可以由唐、牟二先生對朱子理解與詮釋之差異，重新反省當代新儒家對宋明理學之定位；其次，也可以由唐、牟二先生詮釋之差異，重新檢討當代新儒家思想內容之同質性與異質性，進而以之做為日後開展之參考。本計畫即是基於以上之反省，分別由方法論、內容、評價三種面向，展示唐、牟二先生對朱子理解與詮釋之異同。由於朱子思想豐富，因此，對朱子要做一明晰之定位並不容易，本計畫在此亦只是加以客觀比較，暫不進行判教式的終極論斷。基本上，唐先生是以思想史的角度做為方法論之基礎，在內容上強調與其後之哲學思想之互動互補，而且仍將朱子視為儒學之正宗。至於牟先生則是以理論系統為首要關懷，在內容上著重朱子基本概念及理論系統之建構，而以「繼別為宗」做為朱子思想之定位。由於牟先生如是定位朱子，也使其對宋明理學之分系有別於傳統，而以五峰蕺山系、

伊川朱子系與象山陽明系三系分立為內容。至於唐先生則對此並無特殊之立場，此則與唐先生即哲學史以言哲學之立場相一致。就此而言，牟先生對朱子思想之理解與詮釋顯然是較唐先生更具革命性，因為朱子正宗之地位於焉動搖。然而也正因為牟先生準確地理解朱子，反而突顯朱子思想之特殊性價值，使朱子在宋明理學甚至整個儒學的發展中，佔有極關鍵性的地位。

（二）關鍵詞

道、理、氣、心、性、情、格物致知、大學、中和、心統性情

二、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一）Abstract:

Mr. Tang, Jun-yi (唐君毅) and Mr. Mo, Zong-san (牟宗三)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s of contemporary Neo Confucianism. What they said are paradigms and the main contents as well as academicism of contemporary Neo Confucianism. Withal, as the famous philosopher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Zhu-xi (朱熹) begot many important influences. But the point is, the two masters, Mr. Tang and Mo,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appreciations about the paternity of Song-ming-li-xue (宋明理學), Zhu-xi. Barring other new discoveries, there 're two problems we have to notice at least. Firstly, we can review the contemporary position of Song-ming-li-xue which Neo-Confucians give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r. Tang and Mo. Secondly, we can introspect the homogeneitie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the content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from Mr. Tang 's and Mo 's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we are able to take the differences as references for relative studi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above descriptions, in this project, I 'll display the equipollence and difference of Mr. Tang 's and Mo 's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s appreciations on Zhu-xi from three dimensions: methodology, contents and values. Zhu-xi 's academicism is fertile, therefore, it 's not easy to have a clear position for him and I 'll just compare them objectively and contemporarily not make a critical conclusion. .

（二）Keywords:

humanity, mind, get knowledge by against objects, mind controls sentiments

三、報告內容

（一）前言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其間之發展大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先秦儒學也是第一期儒學，代表人物與作品是孔子、孟子、荀子、《中庸》、《易傳》及《大學》。其次是宋明理學，也是第二期儒學，其以拒佛老，重開道德文化理想為職志。再其次是當代新儒學，也是第三期儒學，諸如梁漱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都是代表人物。在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中，影響學術發展最為明顯而重大者，應首推唐君毅與牟宗三兩位先生。兩位先生雖同為新儒學之大師，但在為人風格及學術研究上皆有其差異，其中對宋明理學理解之差別尤其值得吾人重視。蓋宋明理學上承先秦儒學，下開當代新儒學，此中成為調適上遂的重要關鍵所在，我們由唐、牟二先生對宋明理學之定位，可以確認其對先秦儒學之理解，而且也可以說明當代新儒學對宋明理學的承繼與不同於宋明理學之創新之所在。易言之，如此的研究可以確認當代新儒家對儒學本質之理解態度，同時也能掌握當代新儒家日後發展之軌跡，及其與宋明理學不同所在。問題是宋明理學六百年的發展要做一比較並不容易，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較為適當的參考點，此中，我們選擇了朱子，由唐、牟二先生對朱子理解之異同，看其對儒學本質、宋明理學之定位及當代新儒學之發展等諸多問題之異同。之所以選擇朱子，是因為朱子在傳統儒學發展中具有關鍵性之定位。朱子之前的宋代理學，朱子皆有詳細之討論，而對朱子同時的學者亦與朱子有深入的討論，及至朱子之後的宋明理學亦受到朱子深厚之影響。無論吾人如何評價朱子，只要想對宋明理學有深刻而正確掌握者，都不得不面對朱子而予以清楚地理解與掌握。以上是就客觀學術史角度而言朱子之地位與重要性。然而，真正決定本研究對朱子的選擇，主要原因還是在牟宗三先生對朱子之定位。

眾所周知，牟先生對宋明理學的詮釋中，最具革命性見解與貢獻的，便在其對朱子之定位，謂之為宋明理學理解上的哥白尼革命亦不為過。牟先生依其對二程學之批判，以及朱子對二程學之回應，逐步釐清朱子真正之立場與態度，由是而確定其前後期之差異，成熟而自覺的朱子思想系統，乃是依伊川思路發展，而有違於先秦孔孟之學以及明道學之立場，是以朱子並非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者，而僅為承伊川之「繼別為宗」。此定位成立之後，無論二程、五峰、象山、陽明等人與朱子學之關係，甚或其

間之定位亦一一朗現。只是這樣革命性的見解在新儒家其他大師的態度又如何呢？這是本計畫所關心的。即以唐先生為例，唐先生並未明言牟先生對朱子學理解是否能成立，唐先生只是客觀地陳述了他自己對朱子的理解。然而，唐先生的理解仍屬傳統立場，而與牟先生之論有明顯的差別與不一致。因此，本計畫即是試圖釐清其間之異同所在。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釐清唐、牟二先生對朱子學之理解與定位問題。具體論之則有以下數點：

- （一）說明當代新儒家在中國儒學傳統的重要性，而唐、牟二先生之地位尤其重要。
- （二）要了解當代新儒學之成果及其日後發展之可能方向，則有必要釐清其代表大師間關係之異同，而朱子正是比較的參考點所在。
- （三）本研究分別由「方法論」、「文獻之定位」及「思想內容之詮釋與定位」三方面，討論唐、牟二先生理解之異同。
- （四）重新確認二先生思想及性格之差異，並試圖由此差異，看出後繼者的可能取向與發展。

三、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畫有關文獻之運用大分為以下三類：

- （一）朱子之作品
- （二）唐、牟二先生對朱子學之詮釋作品，此中之文獻集中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以及《心體與性體（三）》二書，此亦為本計畫主要文獻依據。
- （三）唐、牟二先生相關之作品以及其他學者對朱子及唐、牟二先生之討論。

由於本計畫乃是以唐、牟二先生對朱子學理解詮釋之比較研究，因此基本上是屬於第二序的研究。易言之，唐、牟二先生對朱子之研究是第一序，而吾人對唐、牟二先生之研究乃是第二序，因為是第二序，因此，有關朱子之作品研究乃是本計畫所預設之能力，是在對朱子學有基本掌握之後，才能對唐、牟二先生的朱子學進行比較。在引用方面雖多，然只是用以支撐判斷唐、牟二先生之理解，並不以其為重心。至於相關之作品，歷來學者對唐、牟二先生朱子學之比較仍未有明顯開展，是以本部份之作品仍以唐、牟二先生之作品為主軸。當然，最具決定性之作品仍以第二部份之二部論著為主。關於此，唐先生之全集早已出版，而牟先生之全集則在民國九十二年出版，而且其中尚有部份未編入，例如：三民書局之《生命的學問》即其例也。所幸有關宋明理學的部份堪稱完備，參考引用甚為方便也。至於學者之專書部份，蔡仁厚教授之

《宋明理學南宋篇》、陳榮捷先生之《朱學論集》以及劉述先先生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都是值得參考的作品。

四、研究方法

做為哲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理論系統的優劣得失自然是比較的重要關鍵所在。本研究在操作策略上，首先是就方法論加以比較，唐、牟二先生之所以會對朱子學得出不同的理解與詮釋，乃是與其方法論息息相關，因此，方法論的討論自然是首要的內容。只是我們也必須注意的是，方法論並非獨立存在的內容，某位哲學家之所以會選擇此種方法而不選擇別種方法，仍是有其自覺之價值選擇，而唐、牟二先生在此亦有其不同的著重點，是以有不同之方法選擇也。其次，則是其對朱子作品之討論。除了方法論之差別外，由於朱子著作豐富，享壽亦高，學問必有其發展性。此中，我們對朱子之作品是完全視為一致呢？還是視為有相互不一致，以致應加以分期討論呢？在此，唐、牟二先生之態度顯然不同。唐先生以一致視之，而牟先生則認為應該加以分期。第三，則為理論系統之比較，唐、牟二先生是如何建構朱子學系統，朱子與其同時代及先後時代學者之異同關係又如何？凡此皆為討論之重點。第四，則進入理論的評價部份。唐先生仍視朱子為理學之集大成者，其學與儒學無本質之差異。而牟先生則判朱子為別子為宗，與先秦孔孟儒學以及濂溪、橫渠、明道、象山、五峰、陽明之學，皆有本質上之差別。由以上看來，本研究之方法論仍屬理論系統之比較法，由是而展開詮釋系統之對比研究。至於勞思光先生所提出之「基源問題研究法」，主要是針對哲學史研究而發，未必相應本研究對理論系統比較之要求，故暫不採用。

五、結果與討論

有關結果討論部份，擬依研究方法所論之三部分逐一敘述如下：

（一）方法論之比較

1. 唐君毅先生之方法論

唐先生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自序中，論及「論述方式」時，有如下的說明：

至於就此書之論述方式而說，亦與原道篇之為「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方式無殊。所謂即哲學史以論哲學者，即就哲學義理之表現於哲人之言之歷史秩序，以見永恆的哲學義理之不同型態，而合以論述此哲學義理之流行之謂。既曰流行，則先後必有所異，亦必相續無間，以成其流，而其流亦當有其共

同之所向。(《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9)

哲學是人的產物，而人又是時間性的存在，因此，哲學亦因人的時間性而表現出歷史性與時間性。人誠然是通過哲學來追求真理，但是人也永遠是在歷史文化的視域中去追求、理解、呈現其所掌握的真理，而如是的歷史文化視域也就形成哲學思想之特殊性與歷程性。其為特殊，乃是因為此中之視域與個人主觀特質不必相同，因而呈現出相對的差異與特殊，墨子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雖是強調此中公義之不可得，但卻也突顯此義之豐富與人對義理解的特殊與多元。雖然哲學思想人人不同，但是這樣的特殊性並不是一種孤立絕緣的「單子」(mona)，特殊性並不必然就是孤立與絕緣，反之，由於人是歷史文化下的產物，因此人的哲學思想也因為有此歷史文化背景的共通性而有共同的基礎，進而構成彼此對話、相互溝通的可能。尤有進者，這不但是一種可能，而且根本是一種必然，何以故？以人無法脫離此歷史文化而存在也。無論吾人對此歷史文化採取正面或負面的立場，必須面對、對話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樣的對話一旦放在時間中，便明顯看出哲學思想的歷程性與連續性。即以宋明理學為例，唐君毅先生便是以一種既特殊又連續的歷程義對宋明理學內容之種種說、種種理論、種種立場加以動態的展示。所謂動態的意義，是指哲學思想並非一封閉的系統呈現在哲學史中，它一方面有所繼承，另一方面又有所開展。在繼承方面，它解決了或回應了以往哲學家所遺留的哲學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或轉化；在開展方面，則其理論系統亦必然會因為重點之不同而對某些問題未能一一回應，或遺留某些理論預設有待釐清，凡此即成為其後哲學家必須面對、繼承、開發的對象。由此看來，哲學即哲學史，並沒有一套脫離歷史時空的哲學，此所以以「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深意所在。此唐先生云：

依吾平日之見，嘗以為凡哲人之所見之異者，皆由哲學義理之世界，原有千門萬戶，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間，周旋進退，還當相遇；則千門萬戶，亦應有其通。故今本歷史秩序，以論此宋明儒學中哲學義理之流行，亦當觀其義理流行之方向，如何分開而齊出，又如何聚合而相交會；不先存增益減損之見，以於同觀異，於異見同，方得其通。然後得於此哲學義理之流行，見古今慧命之相續。故此觀同異之事，宜當循諸儒思想之先後衍生，而次第形成之序，由原至流，再窮流竟委，以觀之。如專於其流之既分異之已成處，加以對比平觀，則將只見思想義理型態之相對成別，以為方以智之論述，其極固可至於在義理之世界，見天開圖畫；然尚未必能見其義理型態之相攝之通，而為圓而神之論述，以極至於在義理之世界，如聞天音天樂之流行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10)

依唐先生，此哲學家之種種內容雖千差萬別，然不害其相通相會，果能納入歷程義加以掌握，則其差別不但難理解，且成為哲學發展必經之歷程。而唐先生亦不重在

分解其理論內容，而重在依其發展以明其理論精神，以及其與其先後哲學之關係。此唐先生自謂：「若剋實言之，則吾之論述宋明儒之每家之學，皆只提示吾所視為有較特殊之承先啟後之哲學意義為止。然一家之學，固不以此而止也。又對此特殊義，吾亦多只略引其一二言為據，未嘗於其嚴加以盡舉。」（《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11）而唐先生對朱子學之理解亦正是在此方法論態度下展開。

2. 牟宗三先生之方法論

牟先生在《心體與性體（一）》的序言中，曾對「了解」有分別之說明：

王龍溪有言：悟道有解悟，有證悟，有澈悟。今且未及言悟道，姑就宋明六百年中彼體道諸大儒所留之語言文字視作一期學術先客觀了解之，亦是欲窺此學者之一助。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彷彿一二，望文生義，曰感性之了解。義義釐清而確定之，曰知性之了解。會而通之，得其系統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心體與性體（一）》序，頁一）

又，

理性之了解亦非只客觀了解而已，要能融納於生命中方為真實，且亦須有相應之生命為其基點。否則未有能通解古人之語意而得其原委者也。（《心體與性體（一）》序，頁一）

依牟先生，理性的了解不但有客觀之了解，同時也要能有生命上的相應，而此種相應乃是因為人能與此文化內容有真實之體會以證成之，而非只是知識性之理解。當然，理性的了解乃是相應客觀文獻而發，因此，知性的了解是必要的，必須先有客觀文獻語意之掌握，而後才能避免望文生義，進而才能掌握其中理論系統，並予以整體之會通也。基於如是之立場，牟先生乃在〈綜論〉部分，分五章分別對基本概念、文獻及其相關問題予以定位，這樣的定位當然有知性的了解，然而既是提綱挈領之作，自然也就表現更多的理性了解。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宋明儒之分系」及「別異與簡濫」二部分。此二部份之內容固然是革命性的見解，但是在方法論上亦可看出牟先生較重視個別理論系統之比較，不似唐先生是以互動相生的動態發展方式加以理解。正是在此差異上，二先生對朱子學之理解亦有十分重大的差異。相對於理論系統之比較，朱子學被牟先生判為「別子為宗」；而相應於動態發展，朱子被唐先生視為是繼承二程又開啟陽明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並無歧出之嫌。當然，這樣的差別是否皆由方法論而決定呢？我們可以由二先生對文獻之態度上加以回答。

（二）文獻分類之比較

1.唐先生對朱子文獻之分類

朱子言讀書、言格物，及心與理之論，與其言德性工夫，如主敬涵養，與「心」之關係之論，固為朱子之學之一根本，尤為朱子早年之學之所重，亦為其與象山之學不同之一大端所在。此吾已於朱陸異同探原中，述其大體，今不擬重複。至朱子言心與理之關連於格物與讀書者，則為其晚年教學者之所持重。朱子以此教學者，同時教學者以聖人為法，而其重格物、讀書之教，則亦與其言聖人之知能之處，密切相關。（《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58）

唐先生明確地意識到朱子早年與晚年之區分，但是在文獻的使用上卻不以早晚之分期，言其對義理思想有本質上之轉變或差異。易言之，唐先生意識到朱子早晚期之區分，但這僅是個人生命發展之歷程，並沒有前後義理在本質上的差異，我們從唐先生對朱子文獻的引用即可明確證成此點。

2.牟先生對朱子文獻之分類

相對於唐先生，牟先生則不僅區分早晚期的朱子文獻，而且認為此中有異質性的轉折與發展。《心體與性體（三）》第一、二、三章，詳細地說明了朱子由二十四歲至四十二歲間的思想發展與轉折，此中尤其以四十歲所完成之〈中和新說〉為決定性的轉折點。〈中和新說〉之前，朱子接近傳統，而在〈中和新說〉之後，朱子便開始建立與傳統相異的儒學傳統。也因此，四十歲之後的文獻與四十歲之前的文獻，在研究朱子學上便應嚴加區分，否則無法掌握朱子真實之面貌。

即就方法論而言，由於唐先生重視理論之傳承發展，是以特重其間之相似與聯繫，進而亦不重視此中前後期文獻之差別。反之，牟先生則以理論系統之理論為主軸，因而對比出前後文獻之差異，同時更具有理論上之決定性。由此看來，文獻之客觀內容固然是理解之基礎，然而理解之方法與態度亦有其一定之影響也。

（三）思想內容之比較

1.唐先生的理解

唐先生對朱子學之理解主要有二部分，其一是《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三）》附錄部分有〈由朱子之言理先氣後，論當然之理與存在之理〉一文，此文詳細說明所謂之先後有五種，此即：時間上之先後，心理認識上之先後，知識論之先後，邏輯上之

先後，形而上之先後。並說明如何說明理先氣後做為一種形上之先後。唯此文乃集中在理氣先後問題，此義與牟先生之立場較無本質上之差別，因此，比較之重點仍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中〈朱陸之學聖之道及王陽明之致良知之道（中）〉一文。由於是相對於朱陸為學異同之背景而展開，因此，唐先生亦首先由朱子論學開始討論。朱子並不反對象山之學所言簡要之道，唯其尤重為學應有充實之內容以回應此簡要之道。蓋此簡要之道只是一方向，其具體而豐富之內容正要由日常生活之種種理加以充實，此其所以特重《大學》之格物致知也。依朱子，知不能只是虛說良知，而應該落實在當下之種種事物之理中，是以格物乃能致知也，豈有空頭地去掌握良知之理乎？致知之理既由格物上顯，則所格之物愈多，其所顯之理亦愈豐富，所謂分殊之理愈為細密也。是以朱子之為學，乃以儒學多聞為貴也，此非是對種種客觀知識之量的重視而已，而尤在依此以顯理一之豐富內容也。唯朱子雖重儒學，亦非一泛知識論，而以其成聖人之道為範圍，唐先生謂朱子：「則其言以經為主人，亦即以理為主人；而其初有六經，亦終為六經。則與象山陽明之意，仍無別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65）朱子在讀書內容之細密上與象山陽明真言心性而可脫略文字之態度誠有不同，「然謂讀書即做事之一，義理既通，當據之以評判史事之是非，陸王固無加以反對之理由。而讀書既是做事之一，則放下書卷，脫略文字而做他事，如陽明之建功立業，象山之治其家族之事，或暫優游自在，專事涵養，朱子亦無加以反對之理由。則此中個人態度所偏重者之異，固無義理之衝突之可言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66）

有關朱子論格物致知，唐先生認為主要問題有二，其一是格物之限度，唐先生謂：「則朱子大學補傳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以至『眾物之表裡精細無不到』，文雖若有於天下之物無不格之意，然在實際上，其格物之事固只以當格之物為限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68）就此而言，朱子並非一泛格物論者。其二是格物窮理之事，畢竟在外或在內之問題，此問題極具關鍵性，唐先生以三義論之：

由上段所說，吾人便知朱子所謂格物窮理之事，實當自三面了解：其一是：吾人之心之向彼在外之物；二是：知此物之理，而見此理之在物，亦在我之知中；三是：我之「知此理」，即我之心體之有一「知此理」之用。此知理之用，即此心體所具此理之自顯於此知中；故謂心體具理，即謂心具理以為其體、為其性也。然此性理之顯，必待於心之有所向所知之物而得顯。故即其物以致其知、窮其理，即所以更顯吾人之心體中所原具之此理，亦所以顯吾人之性，而使吾人更知此性者。故窮理之事，即知性之事。知性本為知自己之內在的心之體、心之性。然不接物而致其知、窮其理，又不能真昭顯此性而知性。（《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71）

吾人之心即理、性即理，在朱子皆可承認。唯朱子認為心性之理之真實而具體之內容仍在其當下之應對進退間呈現，亦即在其格物致知中呈現，此所謂「求諸外而明

諸內」之事也。孟子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說人之不安不忍之心，亦即是「求諸外而明諸內」之事。問題是，若心即謂成立，則吾人不必一定通過格外在之物而能明此心之理，凡吾人之起心動念，亦無一不顯此心理之昭然，此乃有慎獨之說也。吾人不必否認朱子「求諸外而明諸內」之說，然此義只是一義，非唯一可有之義也。同時，朱子明謂「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於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官之。」（此文為唐先生所引用之文）。由「理雖在物」而言，則「心之體具乎是理」之「具」便是通過格物致知而後具之，亦即是「後天的當具」而非「先天的本具」。而「理則遍天地之間」卻不明言心即理，則「心則官之」顯然是以「官中之虛，即所以喻心之虛靈也。天地萬物之理之用，在此心之虛靈中見。此又證吾人之心，原能知此理，此心之自有能『知理』之一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70）至於唐先生由心之知理，而推論理原為吾心知所具，此則尚待更充分之文證也。唐先生結論道：

在朱子之言心之性理處，更處處言此中直下萬里具足，此乃人之所得於天而具於心者。故時以「一性渾然，而道義全具、萬里燦然」為說。此性理之原超越地內在於心，以為心之本體之義，朱子與陸王未有異。其與陸王之分別，唯在朱子於心之虛靈知覺，與其中之性理之內容，必分別說。故心之虛靈知覺本身，不即是性理。由是而人亦不能只反省其心之發用之處，及以為足以見性理之全。此心之接事物，而更求知其理，即所以昭顯此性理。（《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274）

關於此，筆者的說法是設想朱子的「心之虛靈」乃是「良知之無內容」義，而心為一切理之最後管攝處，而不即是一一分別之理，大有「理一分殊」中「理一」之地位。（見《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拙文〈格物致知新論——兼論台北市的文化地位及其發展方向〉，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89 年 12 月）。然以上諸說似乎與「心即理」之義有其距離，而此距離正為牟宗三先生所清楚掌握者也。姑不論唐先生對朱子「心即理」義之證成是否充分，吾人由牟先生所舉之反證亦可發現朱子似乎還不肯定「心即理」。例如，除了朱子與象山十分直接的論辯外，朱子對逆覺體證義之反對，對五峰《知言》以八端致疑，是明道識仁、定性之不契，皆可反證朱子之立場誠然與傳統有別，而非如唐先生所認為只是工夫入路重點之差別而已！

2. 牟宗三的理解

唐先生雖然在論及朱陸異同，甚至日後陽明與朱子之異同諸問題上有別於傳統。唐先生在傳統相對的朱子、象山，以及朱子、陽明之差別中，不但找出其間一貫而有之一致性，同時也說明其間的互補性與互動性，這是唐先生對宋明理學詮釋中最大的貢獻之一。然而，唐先生畢竟仍然是在傳統的架構上展開其互補、互動的動態性詮釋，

並不否定傳統的主流意見。相對於此，牟宗三先生則展開其哥白尼式的革命，對宋明理學有完全異質於傳統的詮釋。牟先生對宋明理學展開新詮釋的起點乃是在有關二程學之定位。

牟先生的問題起點是：歷來對程明道之肯定與尊崇是十分一致的，然而，明道先生如此顯赫之地位在歷來的詮釋與討論中卻不見具體的敘述。誠然，明道先生境界之高傲乃世人一致肯定之內容，然而明道先生顯赫之地位僅僅是如是之境界即可充分支持嗎？明道先生難道沒有具體的學問系統做為其地位之基礎嗎？循此問題，牟先生首先要確定明道先生學問之根本精神及內容果為何物？問題是：明道先生與伊川先生兄弟為世人並稱為二程，因為是二程並稱，是以二程間之差別性便隱而不顯，要確定明道就必須先確定二程之異同。牟先生之方法十分簡單，首先以文獻中明言為明道所說者為基礎，從中整理出明道的思想內容及特色，而後再以這樣的內容及特色，去判別標明為二程共有之文獻究竟是屬於明道或是伊川。經過以上之研究，牟先生將明道思想以圓教型態歸屬之，而伊川則屬於分解的型態。不但如此，伊川在明道過世之後，獨立講學達廿年之久，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已然與明道思想產生差異。因為伊川是以然與所以然對比的分解方式對道加以掌握，是以無形之中道的「感而遂通」的動態面逐漸喪失，而重在以「寂然不動」的靜態義說明道。這樣問題明顯地表現在《中庸》首章的討論上，也就是「中和問題」。由於伊川是不自覺的轉向，因此，其在中和問題上雖有其特有之轉向，卻也同時仍夾雜一些模糊的觀念，而這樣的問題最後是由朱子加以徹底地釐清。

朱子早年仍是以傳統思想為依據，此時其思想之特色與傳統無異。及至其四十歲發表〈中和新說〉、〈仁說〉等文，其思想之異質性於焉確定。首先，朱子依其然與所以然之分解模式，道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全義，轉而簡化為「寂然不動」的存有義；「感而遂通」的活動義於焉喪失，此所謂「存有而不活動」也。將道之二義落在《中庸》的已發未發問題上，則朱子的態度便將未發視為不動之理，而已發即為可動之氣，此即構成理氣二分之格局。理即道，乃形而上的不動之理，而氣即為形而下的實然之氣，一切的活動義俱由氣說。此理氣二分若落在心性情上說，則性即理，而情為氣，喜怒哀樂之情未發時為理、為性；喜怒哀樂皆為氣之發用，而屬於形而下者。問題是，此形上之理、不動之寂然之理，與形下之氣，已發之情之間，又當如何聯繫呢？此中之關鍵在心，此所謂「心統性情」。心統性情之統並非統攝義，而是通貫義，也就是心能知性之理而使情皆能發而中節如禮，進而達致中和之說，因此工夫的重心仍在心上面。問題是，心在理氣二分的格局中究竟何處呢？牟先生最重要的判斷之一，便是認定朱子的心並非如孟子所言的本心義，而是一種橫攝的認知心的型態。蓋朱子與象山同能肯定性即理，然象山進而有性即理之說，而朱子卻始終不願接受。心既不即是理，是以心當屬於氣，是所謂「氣之靈」。此氣之靈之心既不即是理，是以理在心外，而心卻知理便不能採用「逆覺體證」的自省，而必須依《大學》格物

致知之教，通過格物之工夫而知理、具理，並以此理統攝此情，使其能發而中節。進而言知，則此心要格物致知，又要能以此致知之理統攝已發之情，是以此中分別有二種工夫可說：其一是靜時涵養，其二是動時察識，而且是主張先涵養後察識。依朱子，吾人在未發之時當以敬涵養此心之虛靈，所謂「涵養須用敬」也；而在已發之時，則當以此虛靈之心察識情之發是否中節合理，此即「進學在致知」，是以致知之理來察識情變，進而成為為學之要也。此義既明，則牟先生由道之所以然與器之然之分解義開始，指出朱子將道理解為「上存有不活動」之偏，而後再配合已發未發說，展開理器二分、心性情三分以及心統性情之格局，而心已為氣之靈。至於工夫則落在《大學》的格物致知，以及後天的「靜時涵養，動時察識」，而以「涵養須用靜，進學在致知」做為工夫之歸宿。而此中無論是道、心性情及工夫論，俱與先秦孔孟之學產生本質上之差異，而獨與伊川思想相契，是以牟先生以伊川朱子為一系，並以「繼別為宗」做為朱子思想之定位所在。筆者認為，唐、牟二先生對朱子學各有其所見，然在根本關鍵處，仍以牟先生之判斷較為精確深入也。

四、參考文獻

一、書籍類

- | | | |
|-------------------------|---------------------|---|
| 《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編 |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0年11月，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50冊，6函) | (清)李沛霖李禎同撰 | 出版項不詳，清近譬堂藏板藜光樓刊本，線裝。 |
| 《朱子大傳》 | 束景南 | 福建省：福建教育社，1992年，1版。 |
| 《朱子及其哲學》 | 范壽康 | 台北：開明書局，1964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文集》 | 陳俊民校編 | 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古文書疑》(8冊，1函，1卷) | (宋)朱熹撰 | 清同治6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刊本，線裝。 |
| 《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 | 大規信良 |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年譜》(4卷，考異4卷) | (清)王懋竑纂訂 |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行狀》 | (宋)黃幹撰佐藤仁解題(朝鮮)李滉輯注 | 台北：廣文書局；中文出版社出版，1972年，初版，據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21輯印。(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的理氣說》 | 簡宗修 | 台北：作者自印本，1983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門人》 | 陳榮捷 |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思想之研究》 | 陳震華 | 花蓮：作者自印本，196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

《朱子原訂近思錄》(2冊, 14卷)	(清)江永集註;(清)王鼎校	上海:中華書局,1927-1935年,初版,據《四部備要》聚珍仿宋版排印本印。(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哲學》	郭振武	台北:作者自印本,1970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	劉述先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書信編年考證》	陳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版。
《朱子訓學齋規》(1冊,16函,1卷)	(宋)朱熹撰	清道光15年,朝邑劉氏刊本,線裝。
《朱子理學美學》	潘立勇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1版。
《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熊琬	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註釋濂關三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2冊)	(清)王植輯	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年,初版,據中國社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元年刻本影印。(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集》(40冊,3函,104卷)	(宋)朱熹撰	清咸豐庚申10年,紫霞州祠堂刊本,線裝。
《朱子新探索》	陳榮捷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新學案》	錢穆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道德哲學研究》	周天令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實紀》(12卷)	(明)戴銑編福田殖解題	台北:廣文書局;中文出版社出版,1972年,據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22輯印。(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語類》(2冊,140卷 百納本)	(宋)朱熹撰(宋)黎靖德編	台北:漢京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定文鈔》(21 卷)	(清) 吳震方輯	《烏石山房文庫》，清康熙 44 年刊本，線裝。
《朱子學》(2 冊，20 函，2 卷)	(明) 丘濬撰	清同治 5 年，福州正誼書院刊，8 年續刊本，線裝。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鄭樸生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刊》(4 輯)	朱子學刊編輯部	合肥市：黃山書社，1991 年。
《朱子學研究》	鄒永賢主編	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年，1 版。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祝平次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遺書》(12 冊)	(宋) 朱熹撰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禮纂》(經部·禮類·雜禮記之屬 54，9 集)	(清) 李光地撰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初版，據《四庫全書珍本》印。(原用「民國」紀年)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11 冊，1 函，10 卷)	(明) 朱澤澐	出版項不詳，清刊本，線裝。
《朱學論集》	陳榮捷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4 月，增訂再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	陳榮捷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	周予同	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年，1 版。
《朱熹人文教育思想研究》	趙顯圭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年譜》	(清) 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	北京：中華出版社，1998 年，1 版。
《朱熹佚文輯考》	束景南編著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1 版。
《朱熹事考》	高令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1 版。

《朱熹和白鹿洞書院》	李邦國	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版。
《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	張健撰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的史學思想》	湯勤福	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1版。
《朱熹的形上結構論》（1982年夏威夷大學國際朱熹學會議論文）	羅光等撰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思想研究》	張立文著	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倫理學》	楊慧傑	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哲學》	黎建球	台北：知音出版社，197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哲學思想》	金春峰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哲學研究》	陳來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教育和中國文化》	朱瑞熙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版。
《朱熹評傳》	張立文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版。
《朱熹集》（10冊）	郭齊 尹波點校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版。
《朱熹與多瑪斯形上思想的比較》（2冊）	黎建球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	張立文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學提綱》	錢穆	台北：作者自印本，1971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辯偽書語》	（宋）朱熹撰	台北：開明書店，1969年，台1版。（原用「民國」紀年）

《宋儒朱熹讀書心法徹底研究》	(宋)黎靖德編；陳仁華譯	台北：遠流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重鰲文公先生奏議》(8冊．2函．15卷)	(宋)朱熹撰(明)朱吾弼編	明萬曆甲辰32年，朱崇沐刊本，線裝。
《御纂朱子全書》(50冊．6函．66卷)	(宋)朱熹撰(清)李光地等奉敕編	《烏石山房文庫》，清康熙52年，武英殿刊本，線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40冊．4函．100卷．續集5卷．別集7卷)	(宋)朱熹撰(清)臧眉錫蔡方炳訂定	清康熙戊辰27年，重刊本，線裝。
《晦庵易學探微》	曾春海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學之比較研究》	陳德仁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再版。(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先生全集》(36卷)	(宋)陸九淵撰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台1版。(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先生年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87冊．3卷)	(宋)李子愿輯；(清)李紱增訂	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年，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10年嚴有俊刻本影印。(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247冊)	(宋)陸九淵撰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語錄》	(宋)陸九淵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1版。
《象山學述》	徐復觀	台北：民主評論社，1954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儒道關係視野中的朱熹哲學》	孔令宏	台北：中華大道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初版。(原用「民國」紀年)

二、論文類

(一) 學位論文

- | | | |
|--------------------|-----|---------------------------------------|
| 《由朱熹形上結構解析其心性論》 | 崔知泰 |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人格教育思想體系》 | 權相赫 |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心性思想之研究》 | 李相勳 | 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心論研究》 | 鄭相峰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成德之教研究》 | 楊斐芬 |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易學研究》 | 江弘毅 |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的理氣心性說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 祝平次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的理氣說》 | 簡宗修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思想中「心」的意義與問題》 | 楊雅婷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思想中道德與知識的關係》 | 胡森永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倫理體系之考察》 | 鄭索伊 | 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原用「民國」紀年） |

《朱子哲學思想之發展及其成就》	梁承武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學與史學研究》	吳展良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	申美子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詩經學要義通證》	李再薰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戴震思想之比較研究》	劉玉國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禮研究》	林美惠	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周易東義》釋法研究》	林益勝	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理氣」哲學思想之研究》	朴龍模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之心性論》	元鍾實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心性論研究》	歐昭賜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主體理論之研究》	柯志明	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以理學詮釋易學之研究》	金尚燮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本體觀念之研究》	李楠永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9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的政治生涯》	葉煬彬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的理學與法律思想——中國傳統社會秩序正當性的探討》	許耀明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思想中「存天理去人欲」之研究》	胡元玲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理一分殊哲學之溯源與開展》	沈享民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經學志業的形成與實踐》	陳志信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與康德道德哲學之比較研究》	王志銘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原用「民國」紀年）
《康德倫理學「自律」問題研究--兼與朱熹「心統性情」比較》	賴賢宗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王兩家詮釋看大學本義》	陳明仁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原用「民國」紀年）
《從道德哲學的觀點論朱子理氣論及心性論》	文炳道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原用「民國」紀年）
《陸九淵的修身教育思想研究》	吳木樹	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道德哲學研究》	傅玲玲	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原用「民國」紀年）

- | | | |
|--------------------------------|-----|---------------------------------------|
| 《象山心學在宋學中之歷史意義》 | 汪義麗 | 台北：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原用「民國」紀年） |
| 《象山的形上倫理說之探源》 | 金東天 |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原用「民國」紀年） |
| 《鵝湖爭議真諦之研究--由朱陸對認知的主張看鵝湖爭議之真諦》 | 方蕙玲 | 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原用「民國」紀年） |

（二）單篇期刊論文

- | | | |
|-----------------------------------|-----|---|
| 「朱子晚年定論」商兌——兼論陽明與朱陸之關係 | 林惠勝 | 《臺南師院學報》23期（1990年5月），頁221-237。（原用「民國」紀年） |
| 「朱子學的網脈與朝鮮前期之朱子學」論要 | 蔡仁厚 | 《華學月刊》116期（1981年8月），頁31-37。（原用「民國」紀年） |
| 「周易本義」與「朱子語類」易論比較 | 張朝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8期（1994年6月），頁1-177。（原用「民國」紀年） |
| 「性即理」的兩個層次與朱子學之歧義 | 蔡仁厚 | 《鵝湖》1卷8期（1976年2月），頁7-10。（原用「民國」紀年） |
| 「象山近禪」說的一個新解釋 | 謝大寧 | 《慧炬》229期（1983年7月），頁26-37。（原用「民國」紀年） |
| 「陽明學大系」評介 ⁽³⁾ --第四卷陸象山 | 戴瑞坤 | 《華學月刊》63期（1977年3月），頁54-58。（原用「民國」紀年） |
| 「飲食男女」是天理或是人欲？--朱子觀點的檢討 | 童小鈴 | 《孔孟月刊》34卷10期（總406期）（1996年6月），頁41-45。（原用「民國」紀年） |
|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牟宗三著） | 徐惠隆 | 《明史研究專刊》3期（1980年9月），頁209-224。（原用「民國」紀年） |
| 大陸朱子學研究近況 | 高令印 | 《國文天地》8卷1期（總85期）（1992年6月），頁31-36。（原用「民國」紀年） |

今日朱子--錢穆先生及其著述	李家祺	《書評書目》46期(1977年2月),頁24-31。(原用「民國」紀年)
元代之朱子學	陳榮捷著 萬先法譯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4卷4期(1981年4月),頁9-19。(原用「民國」紀年)
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	狄百瑞著 侯健譯	《中外文學》第8卷第3期(1979年8月),頁66-76。(原用「民國」紀年)
元代的朱陸合流與元代的理學	唐宇元	《文史哲》1982年第3期(總第150期)(1982年5月),頁3-12。
元儒金履祥之朱子學	龔道運	《國立編譯館館刊》10卷2期(1981年12月),頁87-112。(原用「民國」紀年)
元儒郝經之朱子學	龔道運	《國立編譯館館刊》9卷1期(1980年6月),頁1-23。(原用「民國」紀年)
元儒許衡之朱子學	龔道運	《國立編譯館館刊》第8卷第2期(1979年12月),頁195-210。(原用「民國」紀年)
公私之辨	朱子赤	《黃埔月刊》339期(1980年7月),頁8-10。(原用「民國」紀年)
心與理的統一：陸象山	陳榮捷原著陳瑞深 譯註	《花蓮師院學報》1期(1987年10月),頁219-252。(原用「民國」紀年)
毛奇齡評朱子詩說論衡	曾美雲	《中國文學研究》8期(1994年5月),頁157-196。(原用「民國」紀年)
王陸一及其詩詞	劉象山	《文藝復興》96期(1978年10月),頁43-49。(原用「民國」紀年)
王陸一傳	劉象山	《近代中國》101期(1994年6月),頁214-220。(原用「民國」紀年)
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平議	劉一葦	《黃埔月刊》229期(1971年5月),頁13-14。(原用「民國」紀年)

王陽明傳習錄辯朱子注三則再議	張慧芳	《孔孟月刊》26 卷 6 期(總 306 期) (1988 年 2 月), 頁 45-49。(原用「民國」紀年)
王陽明與陸象山	戴君仁	《孔孟學報》24 期 (1972 年 9 月), 頁 171-178。(原用「民國」紀年)
北宋論語注本與朱子集注 (上)	李紹戶	《建設》23 卷 9 期(1975 年 2 月), 頁 29-33。(原用「民國」紀年)
北宋論語注本與朱子集注 (下)	李紹戶	《建設》23 卷 10 期 (1975 年 3 月), 頁 31-35。(原用「民國」紀年)
弘道教育的朱子	王煥琛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5 卷 8 期 (1972 年 8 月), 頁 57-65。(原用「民國」紀年)
本心論	王金凌	《輔仁國文學報》14 期 (1999 年 3 月), 頁 15-24。(原用「民國」紀年)
由陸象山之存養論而探索儒家形而上的拯救意識	封尚禮	《景風》37 期 (1973 年 6 月), 頁 4-8。(原用「民國」紀年)
再論朱子歸入自律倫理學的可能性	張子立	《鵝湖》26 卷 5 期(總 305 期)(2000 年 11 月), 頁 54-6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象山對於易傳的「太極」與「陰陽」之理解 - - 以朱陸「無極與太極及陰陽」之辯為中心	黃甲淵	《中國文化月刊》152 期 (1992 年 6 月), 頁 98-12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呂祖謙與近思錄	李甲孚	《中央月刊》7 卷 4 期 (1975 年 2 月), 頁 106-11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陽明與船山之格物義	曾昭旭	《鵝湖》5 卷 6 期(1979 年 12 月), 頁 9-1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仁說」思想大要--中和新說後之思想歸結	蔡介裕	《中國文化月刊》159 期 (1993 年 1 月), 頁 51-6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易學啟蒙」初探	林文彬	《興大中文學報》9 期 (1996 年 1 月), 頁 231-24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知行」論之實義 (上)	黃甲淵	《中國文化月刊》153 期 (1992 年 7 月), 頁 95-11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知行」論之實義 (下)	黃甲淵	《中國文化月刊》154 期 (1992 年 8 月), 頁 111-12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格物致知」工夫論的義理背景與其過程 (上)	黃甲淵	《鵝湖》19 卷 9 期(總 225 期)(1994 年 3 月), 頁 9-1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格物致知」工夫論的義理背景與其過程 (下)	黃甲淵	《鵝湖》19 卷 10 期(總 226 期)(1994 年 4 月), 頁 48-5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道心人心之辨」的研究	郭振武	《中國國學》16 期 (1988 年 10 月), 頁 241-24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詩之本」說發微	彭維杰	《國文學誌》2 期(1998 年 6 月), 頁 39-8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人性論	郭清寰	《高雄師院學報》8 期 (1980 年 1 月), 頁 1-3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太極與聖多瑪斯之上帝	黃培鈺	《哲學論集》20 期 (1986 年 7 月), 頁 119-12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四書學	錢穆	《復興崗學報》6 期 (1969 年 6 月), 頁 1-2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宗教實踐	陳榮捷	《華學月刊》127 期 (1982 年 7 月), 頁 1-1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師劉子翬	王煜	《書目季刊》21 卷 2 期 (1987 年 6 月), 頁 45-5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之道德的宇宙論	黎華標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4 期(1972 年 9 月), 頁 157-16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太極即理說	戴景賢	《書目季刊》10 卷 4 期 (1977 年 3 月), 頁 25-3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心性之學綜述	蔡仁厚	《東海學報》27 期（1986 年 6 月），頁 59-7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心性論的初步探討	田中真一	《哲學年刊》（臺大）3 期（1984 年 11 月），頁 2-1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心學發凡	王孺松	《師大學報》23 期（1978 年 6 月），頁 141-16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文學理論初探	李美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6 期（1982 年 6 月），頁 495-56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以「至知、物格」解「盡心、知性」說	張素卿	《中國文學研究》2 期（1988 年 5 月），頁 109-13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以大學為定本的義理規模	蔡仁厚	《華學月刊》93 期（1979 年 9 月），頁 28-3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四書集註稱引人名及所見篇章索引	陳光政	《孔孟月刊》19 卷 9 期（1981 年 5 月），頁 54-5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錢穆	《故宮季刊》16 卷 1-2 期（1981 年秋-冬），頁 1-2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如是說	費海璣	《中華國學》6 期（1977 年 6 月），頁 25-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年譜（1130-1200 年）	周憲文	《銘傳學報》18 期（1981 年 3 月），頁 339-34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早年的教育環境與思想發展轉變的痕跡	劉述先	《幼獅學誌》15 卷 3 期（1979 年 6 月），頁 81-9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自稱	陳榮捷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5 卷 5 期（1982 年 5 月），頁 33-3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固窮	陳榮捷	《書目季刊》15 卷 2 期（1981 年 9 月），頁 3-1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性情論及韓儒李退溪四端七情說研析	蔡茂松	《歷史學報》(成大)2 期 (1975 年 7 月), 頁 141-17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所定國風中言情諸詩研述	程元敏	《孔孟學報》26 期 (1973 年 9 月), 頁 153-16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易例及易傳比較研究	程元敏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4 期 (1969 年 11 月), 頁 1-3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易學	于維杰	《中國國學》24 期 (1996 年 10 月), 頁 73-8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易學的人生哲學	曾春海	《哲學論集》17 期 (1983 年 7 月), 頁 69-9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易學的宇宙論	曾春海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2 期 (1983 年 6 月), 頁 289-30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泛論心地工夫	錢穆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 卷 12 期 (1969 年 12 月), 頁 11-1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人生論	祖蘭舫	《公保月刊》20 卷 6-7 期 (1979 年 2-3 月), 頁 17-1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人生觀與人性論	周世輔	《生力月刊》4 期(總 41/42 期)(1971 年 3 月), 頁 28-3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中和舊說與新說--關於朱子思想的演變發展與完成	蔡仁厚	《孔孟學報》37 期 (1979 年 4 月), 頁 165-17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心性觀與格物致知	張慧芳	《靜宜人文學報》8 期 (1996 年 7 月), 頁 55-6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志業 - - 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	張亨	《臺大中文學報》5 期 (1992 年 6 月), 頁 31-8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居敬窮理說	周學武	《書目季刊》9 卷 4 期 (1976 年 3 月), 頁 45-5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武夷櫓歌--兼及對陳註的商榷	王甦	《古典文學》3 期 (1981 年 12 月), 頁 229-25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政治思想與教育思想	周世輔	《生力月刊》4 期 (總 46 期)(1971 年 7 月), 頁 28-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倫理學可歸入自律倫理學嗎?	李明輝	《鵝湖學誌》4 期(1990 年 6 月), 頁 129-13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格物致知說	林正三	《德明學報》12 期 (1997 年 3 月), 頁 189-19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教育思想	宋東炎	《教與學》6 卷 2 期 (1973 年 3 月), 頁 16-1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教育興趣與詩集傳	戴君仁	《文史季刊》1 卷 3 期 (1971 年 4 月), 頁 1-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教育興趣與詩集傳 (續)	戴君仁	《文史季刊》2 卷 2 期 (1972 年 1 月), 頁 1-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教學思想及其影響	黃錦鉉	《教學與研究》1 期 (1979 年 2 月), 頁 1-1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理氣學說	孫寶琛	《孔孟學報》49 期 (1985 年 4 月), 頁 177-19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理氣觀	張慧芳	《靜宜人文學報》2 期 (1990 年 10 月), 頁 89-10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創新	陳榮捷	《哲學與文化》18 卷 12 期 (總 211 期)(1991 年 12 月), 頁 1058-106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道德觀與修養論	周世輔	《生力月刊》4 期 (總 44 期)(1971 年 5 月), 頁 19-2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認知哲學	方蕙玲	《中國文化月刊》95 期 (1987 年 9 月), 頁 95-12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歷史教育	費海璣	《現代國家》92 期 (1972 年 9 月), 頁 8-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的禮學	高明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1 期 (1982 年 6 月), 頁 35-4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門人之各方面及其意義	陳榮捷	《中國文化月刊》11 期 (1980 年 9 月), 頁 109-1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門人性行考	費海璣	《東方雜誌》6 卷 1 期 (1972 年 7 月), 頁 35-3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建立性論思想之分析	吳登臺	《雲林工專學報》4 期 (1985 年 5 月), 頁 327-42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建立道統的理據問題之省察	劉述先	《新亞學術集刊》3 期 (1982 年 月), 頁 21-3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思想與佛家思想的淵源	何美秀	《海潮音》59 卷 4 期 (1978 年 4 月), 頁 29-3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修身論	王孺松	《師大學報》25 期 (1980 年 6 月), 頁 183-20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倫理思想之研究	山根三芳著蔡懋棠譯	《國立編譯館館刊》2 卷 1 期 (1973 年 6 月), 頁 29-6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倫理思想研究	王孺松	《師大學報》26 期 (1981 年 6 月), 頁 159-18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格物之再省察	曾昭旭	《鵝湖》11 卷 3 期(總 123 期)(1985 年 9 月), 頁 10-1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參究中和問題淺探	霍晉明	《鵝湖》16 卷 6 期(總 186 期)(1990 年 12 月), 頁 46-5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形論	黎建球	《哲學與文化》14 卷 6 期 (總 157 期)(1987 年 6 月), 頁 2-1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氣系統之疏解	黎華標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3 期(1971 年 9 月), 頁 151-17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氣論的幾個要點	蔡仁厚	《哲學與文化》2 卷 2 期 (1975 年 2 月), 頁 29-4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氣觀討論	李日章	《大陸雜誌》45 卷 5 期 (1972 年 11 月), 頁 56-6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學與文學裡的定命思想 試論	侯健	《中外文學》11 卷 11 期 (總 131 期)(1983 年 4 月), 頁 4-2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理學與佛學	熊琬	《華岡佛學學報》7 期 (1984 年 9 月), 頁 261-28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評老子與論其與"生生"觀念之關係	陳榮捷	《清華學報》11 卷 1/2 期 (1975 年 12 月), 頁 89-10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詩傳舊說探析	彭維杰	《國文學誌》3 期(1999 年 6 月), 頁 75-10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詩歌理念的探索	郭玉雯	《臺大中文學報》5 期 (1992 年 6 月), 頁 215-24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道德學形態之重檢	李瑞全	《鵝湖學誌》2 期 (1988 年 12 月), 頁 47-6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易傳」「本體」的理解	千炳敦	《鵝湖》19 卷 10 期(總 226 期)(1994 年 4 月), 頁 13-2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北宋古文六家的批評	何寄澎	《幼獅學誌》18 卷 3 期 (1985 年 5 月), 頁 33-5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老子學之評價	陳榮捷著 萬先法譯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 卷 5 期 (1977 年 5 月), 頁 43-4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孟子心性觀及工夫論的理解	黃瑩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9 期 (1995 年 6 月), 頁 501-63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孟子知言養氣說的詮釋及其迴響	黃俊傑	《清華學報》18 卷 2 期 (1988 年 12 月), 頁 305-34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於「孟子」中心性觀念的詮釋	楊雅婷	《中國文學研究》6 期 (1992 年 5 月), 頁 129-15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於古籍訓釋的見解	胡楚生	《大陸雜誌》55 卷 2 期 (1977 年 8 月), 頁 42-4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於惡的來源的說明	傅武光	《國文學報》18 期 (1989 年 6 月), 頁 133-15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對易繫辭傳「形上」觀念之體會	金尚燮	《中華易學》卷 9 期 3 (總 99 期) (1988 年 5 月), 頁 19-2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資治通鑑綱目〉	李甲孚	《中央月刊》6 卷 8 期 (1974 年 6 月), 頁 136-14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王船山對西銘詮釋觀點之比較研究	曾陽晴	《臺大中文學報》2 期 (1988 年 11 月), 頁 377-39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佛教	秦家懿	《新亞學術集刊》3 期 (1982 年 月), 頁 135-14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李退溪性情說的淵源與影響	黃錦鉉	《書目季刊》22 卷 3 期 (1988 年 12 月), 頁 83-8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李退溪涵養與實踐的工夫--附朱子學與李退溪國際學術會議記實	黃錦鉉	《幼獅月刊》46 卷 3 期 (1977 年 9 月), 頁 42-4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書院	陳榮捷著 萬先法譯	《史學評論》9 期 (1985 年 1 月), 頁 1-3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	戴璉璋	《鵝湖》5 卷 6 期 (1979 年 12 月), 頁 2-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語類之成立及其版本	岡田武彥著李迺揚譯	《華學月刊》80 期 (1978 年 8 月), 頁 14-3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說詩先後異同條辨	何澤恆	《國立編譯館館刊》18 卷 1 期 (1989 年 6 月), 頁 195-223。(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說詩前後期之轉變	潘重規	《孔孟月刊》20 卷 12 期(1982 年 8 月), 頁 17-1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德性修養論中的「格物致知」教	曾春海	《哲學與文化》9 卷 3 期(1982 年 3 月), 頁 20-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談讀書	陳宗敏	《孔孟月刊》14 卷 3 期(1975 年 11 月), 頁 2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易」占之吉凶	洪景潭	《中國文學研究》10 期(1996 年 5 月), 頁 221-23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仁	王孺松	《師大學報》24 期(1979 年 6 月), 頁 85-11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居敬工夫	楊斐芬	《建國學報》18 期(上)(1999 年 6 月), 頁 47-6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性之研究	劉承符	《菩提樹》34 卷 8 期(總 404 期) (1986 年 8 月), 頁 20-2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涵養與察識	王孺松	《教學與研究》5 期(1983 年 6 月), 頁 109-1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陰陽	王孺松	《國文學報》8 期(1979 年 6 月), 頁 39-5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詩	劉遠智	《中國語文》48 卷 1 期(1981 年 1 月), 頁 64-67。(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韓愈文之文理	楊勇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 期(1977 年 9 月), 頁 57-7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論韓愈文之氣勢	楊勇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5 期(1973 年 9 月), 頁 83-10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中「天人」架構之意義與特色	尹元鉉	《鵝湖學誌》18期(1997年6月),頁111-16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之自然哲學 (1)	張立文	《孔孟月刊》27卷4期(總316期)(1988年12月),頁18-2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之自然哲學 (2)	張立文	《孔孟月刊》27卷5期(總317期)(1989年1月),頁23-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之自然哲學 (3完)	張立文	《孔孟月刊》27卷6期(總318期)(1989年2月),頁29-34。(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之體與用	廉永英	《孔孟月刊》26卷6期(總306期)(1988年2月),頁31-3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在日本	劉崇稜	《日本研究》139期(1977年7月),頁31-32。(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的新反省與新評價	蔡仁厚	《哲學年刊》1期(1981年12月),頁48-58。(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的綱脈與朝鮮前期之朱子學	蔡仁厚	《鵝湖》6卷5期(1980年11月),頁2-1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流衍韓國考	錢穆	《新亞學報》12期(1977年8月),頁1-6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研究成果的總匯——談〈朱子學研究書目〉	林慶彰	《國文天地》8卷1期(總85期)(1992年6月),頁39-41。(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研究的新起點：紀念朱子誕辰八六〇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論點綜述 (上)	楊青	《孔孟月刊》30卷2期(總350期)(1991年10月),頁29-36。(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研究的新起點：紀念朱子誕辰八六〇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論點綜述 (下)	楊青	《孔孟月刊》30卷3期(總351期)(1991年11月),頁33-40。(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庸章句對新經學新儒學之創見及其序文要旨	華仲	《孔孟月刊》21卷12期(總252期)(1983年8月),頁21-25。(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提綱	錢穆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 卷 11 期 (1969 年 11-12 月), 頁 72-83。(原 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對中韓兩國儒學的影響	高明	《華學月刊》109 期 (1981 年 1 月), 頁 17-2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學與延平學之異途	蔡介裕	《中國文化月刊》(總期 237)(1999 年 12 月), 頁 17-30。(原用「民國」 紀年)
朱子釋「風」	戴君仁	《新時代》11 卷 3 期 (1971 年 3 月), 頁 8-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讀書法	錢穆	《文學思潮》3 期(1979 年 1 月), 頁 173-179。(原用「民國」紀年)
朱子讀書法研究	張錫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集刊》33 期 (1991 年 6 月), 頁 155-164。(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工夫異同論	葉偉平	《鵝湖》3 卷 4 期(1977 年 10 月), 頁 21-26。(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之辯探微	黃芸	《中國文化月刊》233 期 (1999 年 8 月), 頁 32-45。(原用「民國」 紀年)
朱陸心性論比觀	曾春海	《東方雜誌》19 卷 12 期 (1986 年 6 月), 頁 10-17。(原用「民國」 紀年)
朱陸門人及其後學	蔡仁厚	《孔孟學報》39 期 (1980 年 4 月), 頁 191-209。(原用「民國」紀 年)
朱陸異同	譚作人	《嘉義師專學報》5 期 (1974 年 5 月), 頁 145-168。(原用「民國」紀 年)
朱陸異同與康德流派	謝扶雅	《中國文化月刊》80 期 (1986 年 6 月), 頁 19-29。(原用「民國」紀 年)
朱陸通訊詳述	陳榮捷	《華學月刊》61 期 (1977 年 1 月), 頁 17-26。(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無極太極之辯：兼論周敦頤「太極圖」與「太極圖說」的矛盾	張立文	《孔孟月刊》28 卷 5 期(總 329 期)(1990 年 1 月), 頁 33-37。(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論爭的主要問題及其會通	楊祖漢	《歷史月刊》138 期(1999 年 7 月), 頁 52-57。(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論辯	張恭銘	《國立編譯館館刊》26 卷 2 期(1997 年 12 月), 頁 191-214。(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學說之異同	涂公遂講 柏蔭培記	《文史學報》(珠海)11 期(1975 年 5 月), 頁 6-16。(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鵝湖之會	伍振鷺	《臺灣教育輔導月刊》20 卷 8 期(1970 年 8 月), 頁 27-28。(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鵝湖之會唱和三詩新釋	吳有能	《鵝湖》13 卷 3 期(總 147 期)(1987 年 9 月), 頁 30-43。(原用「民國」紀年)
朱陸鵝湖之會補述	陳榮捷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 卷 10 期(1978 年 10 月), 頁 41-46。(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周敦頤事狀」一文的解析--兼論朱子儒學詮釋典範的建立	毛文芳	《孔孟學報》70 期(1995 年 9 月), 頁 231-257。(原用「民國」紀年)
朱熹與新儒學：國際朱子學研討會論文集導言	陳榮捷著 萬先法譯	《哲學與文化》13 卷 10 期(總 149 期)(1986 年 10 月), 頁 22-32。(原用「民國」紀年)
江西陸子靜(象山)--舉頭天外望, 無我這般人	李榮添	《中國文化月刊》12 期(1980 年 10 月), 頁 77-90。(原用「民國」紀年)
佛性、本心與良知——陸王心學與佛學	賴永海	《中國文化月刊》122 期(1989 年 12 月), 頁 29-45。(原用「民國」紀年)
何晏論語集解與朱子論語集注異同隅舉	熊公哲	《中華學苑》36 期(1988 年 4 月), 頁 21-27。(原用「民國」紀年)

宋儒朱子的人格教育	劉貴傑	《社會科教育學報》(竹師)3期 (2000年8月),頁13-24。(原用「民國」紀年)
宋儒談讀書--安定與朱子	胡信田	《幼獅月刊》33卷1期(1971年1月),頁44-46。(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朱子教育思想的體認	于懷錦	《蘭女學報》1期(1988年4月), 頁69-75。(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1)	胡信田	《內明》3期(1972年6月),頁 30-34。(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2)	胡信田	《內明》4期(1972年7月),頁 30-33。(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3)	胡信田	《內明》5期(1972年8月),頁 37-40。(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4)	胡信田	《內明》6期(1972年9月),頁 26-28。(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5)	胡信田	《內明》7期(1972年10月), 頁32-34。(原用「民國」紀年)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 (續 完)	胡信田	《內明》8期(1972年11月), 頁40-44。(原用「民國」紀年)
我寫「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 成」的感想	劉述先	《書目季刊》16卷3期(1982年 12月),頁61-64。(原用「民國」紀 年)
知識與道德之辯證性結構:對朱 子學的一些探討	林安梧	《鵝湖》10卷6期(總114期)(1984 年12月),頁4-11。(原用「民國」 紀年)
知識與道德之辯證性結構:對朱 子學的一些檢討	林安梧	《思與言》22卷4期(1984年11 月),頁1-13。(原用「民國」紀年)
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	何佑森	《幼獅學誌》16卷4期(1981年 12月),頁25-35。(原用「民國」紀 年)
南宋朱陸葉三家說「克己復禮」	周學武	《書目季刊》9卷2期(1975年9 月),頁19-23。(原用「民國」紀年)

南宋至元的朱陸和會思想	張恭銘	《孔孟月刊》35 卷 9 期(總 417 期) (1997 年 5 月), 頁 15-21。(原用「民國」紀年)
姚際恆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	林慶彰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 期(1996 年 3 月), 頁 1-23。(原用「民國」紀年)
建立正心修身標準模式的陸象山先生	周仲超	《江西文獻》97 期(1979 年 7 月), 頁 28-33。(原用「民國」紀年)
看朱子如何批評韓愈並論古人「親盡」之說	薩孟武	《法論》8 期(1977 年 12 月), 頁 17-20。(原用「民國」紀年)
研究朱子門人性行感言	費海璣	《醒獅》10 卷 6 期(1972 年 6 月), 頁 11-12。(原用「民國」紀年)
荀子與朱子	蔡仁厚	《鵝湖學誌》1 期(1988 年 5 月), 頁 33-53。(原用「民國」紀年)
荀子與朱子之「心」論 (上)	黃甲淵	《中國文化月刊》139 期(1991 年 5 月), 頁 104-116。(原用「民國」紀年)
荀子與朱子之「心」論 (下)	黃甲淵	《中國文化月刊》140 期(1991 年 6 月), 頁 105-125。(原用「民國」紀年)
退溪與朱子持敬工夫論之涵義	楊祖漢	《鵝湖》21 卷 10 期(總 250 期)(1996 年 4 月), 頁 22-28。(原用「民國」紀年)
專題書目--朱子研究	李家祺輯	《出版與研究》33 期(1978 年 11 月), 頁 48。(原用「民國」紀年)
從「心具理」觀念看朱子道德哲學的特性	黃甲淵	《鵝湖學誌》23 期(1999 年 12 月), 頁 43-70。(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陸異同」一個方法論看歷史研究中的主客觀問題	謝大寧	《中國學術年刊》5 期(1983 年 6 月), 頁 101-108。(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陸異同」論中國學術主客觀問題--朱陸思維方式探微	陳傳芳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5 卷 2 期(總 26 期)(1994 年 8 月), 頁 174-195。(原用「民國」紀年)

從「國際朱子會議」談起	蔡仁厚	《中國文化月刊》34 期(1982 年 8 月), 頁 102-116。(原用「民國」紀年)
從王陽明對朱子「格物窮理」之反省論其致良知說	蔡淑閔	《中文研究學報》1 期(1997 年 6 月), 頁 63-89。(原用「民國」紀年)
從四書集註章句論朱子為學的態度	大槻信良著黃俊傑譯	《大陸雜誌》60 卷 6 期(1980 年 6 月), 頁 25-39。(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	陳榮捷	《書目季刊》15 卷 3 期(1981 年 12 月), 頁 15-34。(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子陽明的心性觀論民主法治的理論根據	王邦雄	《鵝湖》15 卷 1 期(總 169 期)(1989 年 7 月), 頁 36-43。(原用「民國」紀年)
從朱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管窺朱子思想	莊錦津	《孔孟月刊》17 卷 5 期(1979 年 1 月), 頁 32-34。(原用「民國」紀年)
從自得之學論朱[子]陸[九淵]異同	張璉	《漢學研究》13 卷 2 期(總 26 期)(1995 年 12 月), 頁 119-129。(原用「民國」紀年)
從書坊盜印風氣談宋建刻朱子晦菴文集	昌彼得	《故宮文物月刊》8 卷 9 期(總 93 期)(1990 年 12 月), 頁 66-74。(原用「民國」紀年)
從格物窮理與志道強禮之分野看朱子與船山在若干修為見解上之異同	陳忠成	《孔孟學報》41 期(1981 年 4 月), 頁 309-332。(原用「民國」紀年)
從瑜伽與禪定以論陸象山、王陽明、王龍溪之學非禪非佛	王煜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8 期(1976 年 9 月), 頁 79-117。(原用「民國」紀年)
探象山心學旨要	曾春海	《哲學論集》19 期(1985 年 7 月), 頁 127-144。(原用「民國」紀年)
淺談世紀之交的朱子研究	朱光華	《福建圖書館學刊》(大陸)1998 年 3 期(總 75 期)(1998 年 9 月), 頁。(原用「民國」紀年)

理學的知識論--朱子大學補傳	王基西	《中國語文》87 卷 1 期(總 517 期) (2000 年 7 月), 頁 31-41。(原用「民國」紀年)
被忽略的朱子兩三事	王煜	《華學月刊》131 期(1982 年 11 月), 頁 36-37。(原用「民國」紀年)
陳乾初「大學辨」對朱子的駁難	王昌偉	《鵝湖》24 卷 12 期(總 288 期)(1999 年 6 月), 頁 8-14。(原用「民國」紀年)
陸王一系人性論之省察——「本心即性」下的道德實踐之工夫與境界	蔡仁厚	《鵝湖學誌》2 期(1988 年 12 月), 頁 63-77。(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的思想之解析	李日章	《大陸雜誌》50 卷 4 期(1975 年 4 月), 頁 32-39。(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即理」研究	蔡琪惠	《復興學報》(1999 年 12 月), 頁 337-34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即理」哲學與其「易簡工夫」論	黃甲淵	《鵝湖學誌》20 期(1998 年 6 月), 頁 179-213。(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學」的義理與王陽明對象山之學的了解	楊祖漢	《鵝湖學誌》8 期(1992 年 6 月), 頁 79-131。(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之心學流傳脈絡 (上)	曾春海	《東方雜誌》22 卷 2 期(1988 年 8 月), 頁 14-19。(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之心學流傳脈絡 (下)	曾春海	《東方雜誌》22 卷 3 期(1988 年 9 月), 頁 17-2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之治學態度與讀書方法	范瑞珠	《孔孟月刊》20 卷 12 期(1982 年 8 月), 頁 46-49。(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學之研究	吳盛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7 期(1983 年 6 月), 頁 363-449。(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心學流傳脈絡初探	曾春海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7 期(1988 年 6 月), 頁 127-147。(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先生事略及其學說概要	李友桃	《江西文獻》86期(1976年10月),頁51-5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其人其學	周仲超	《夏聲月刊》195期(1981年2月),頁8-1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心學	孫振青	《國立編譯館館刊》13卷2期(1984年12月),頁92-115。(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本心哲學及其統一中國的構想 (上)	林繼平	《中華雜誌》243期(1983年10月),頁45-47。(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本心哲學及其統一中國的構想 (下)	林繼平	《中華雜誌》244期(1983年11月),頁49-51。(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直指本心	楊祖漢	《鵝湖》1期(1975年7月),頁38-4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政治思想與實踐	曾春海	《哲學論集》21期(1987年7月),頁1-25。(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的認知哲學	方蕙玲	《中國文化月刊》97期(1987年11月),頁103-126。(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知識學研究	莊慶信	《哲學論集》25期(1991年7月),頁133-164。(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研究	陳正一	《實踐學報》13期(1982年3月),頁257-375。(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教育哲學的本體論思想研究	顧春	《教育研究》21期(1991年10月),頁35-42。(原用「民國」紀年)
陸象山與禪初探	曾春海	《哲學論集》20期(1986年7月),頁47-61。(原用「民國」紀年)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	余英時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6期(1974年9月),頁109-140。(原用「民國」紀年)
程伊川「格物致知」說與朱子「知先行後」說	田炳述	《鵝湖》21卷2期(總242期)(1995年8月),頁39-45。(原用「民國」紀年)

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對仁體的詮釋	古清美	《臺大中文學報》2期(1988年11月),頁233-264。(原用「民國」紀年)
評介林斷平著〈陸象山研究〉	胡一貫	《反攻月刊》462期(1989年6月),頁25-28。(原用「民國」紀年)
評朱子中庸章句序	龔樂群	《學園》6卷10期(1971年6月),頁10。(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即理」思想及成德之教	黃春木	《建中學報》4期(1998年12月),頁127-143。(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即理」說淺探	湯倍禎	《孔孟月刊》31卷4期(總364期)(1992年12月),頁32-39。(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之「心即理」	牟宗三	《鵝湖》3卷11期(1978年5月),頁14-20。(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學旨要	曾春海	《江西文獻》131/132期(1988年2月),頁98-105。(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學義理規模下的「本體詮釋學」	林安梧	《鵝湖》13卷9期(總153期)(1988年3月),頁14-24。(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心學與朱陸異同	蔡仁厚	《華學月刊》34期(1974年10月),頁23-44。(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的「心即理」	潘世	《鵝湖》2期(1975年8月),頁24-27。(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思想之初探	陳華漢	《今日教育》34期(1978年6月),頁73-75。(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思想臨終同於老子:孫應時與朱子及陸象山往來書信繫年	黃彰健	《大陸雜誌》69卷1期(1984年7月),頁32-42。(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哲學的面面觀	曾春海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4期(1985年6月),頁219-256。(原用「民國」紀年)
象山學說闡微	何兆男	《女師專學報》3期(1973年5月),頁1-34。(原用「民國」紀年)

陽明評象山說格物	戴君仁	《大陸雜誌》39 卷 4 期 (1969 年 8 月), 頁 21-22。(原用「民國」紀年)
黃東發與朱子	林政華	《孔孟學報》39 期 (1980 年 4 月), 頁 211-222。(原用「民國」紀年)
敬答李明輝先生對「朱子道德學形態之重檢」之批評	李瑞全	《鵝湖學誌》4 期 (1990 年 6 月), 頁 137-142。(原用「民國」紀年)
新儒家思想史 ⁽¹⁷⁾ --集大成之朱子	張君勱	《再生》7 卷 1 期 (1977 年 1 月), 頁 3-13。(原用「民國」紀年)
義利之辨 - - 以象山學為例釋	關亮清	《鵝湖》13 卷 1 期 (總 145 期) (1987 年 7 月), 頁 36-42。(原用「民國」紀年)
試以朱子之學闡述「多、一、無」之我見	洪德和	《儒林學報》10 期 (1994 年 6 月), 頁 14-17。(原用「民國」紀年)
試析朱子「四書集註」於元代興盛的原因	廖雲仙	《勤益學報》16 期 (1998 年 11 月), 頁 303-321。(原用「民國」紀年)
試析論朱子對惡的看法	林營明	《鵝湖》6 卷 10 期 (1981 年 4 月), 頁 7-10。(原用「民國」紀年)
試述朱子之人生論	祖蘭舫	《中央月刊》10 卷 12 期 (1978 年 10 月), 頁 143-147。(原用「民國」紀年)
試論朱陸異同 - - 以心性論為主	林惠勝	《臺南師院學報》24 期 (1991 年 6 月), 頁 273-286。(原用「民國」紀年)
試論朱陸異同 - - 以心性論為主	林惠勝	《臺南師院學報》24 期 (1991 年 6 月), 頁 273-286。(原用「民國」紀年)
試論陳清瀾先生眼中的象山學	陶玉璞	《鵝湖》18 卷 5 期 (總 209 期) (1992 年 11 月), 頁 25-31。(原用「民國」紀年)
劉述先著「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內容簡介	書目季刊	《書目季刊》16 卷 3 期 (1982 年 12 月), 頁 65-66。(原用「民國」紀年)

談朱子大學補傳	林政華	《孔孟月刊》15 卷 7 期 (1977 年 3 月), 頁 30-32。(原用「民國」紀年)
談朱子門人	費海璣	《東方雜誌》6 卷 2 期 (1972 年 8 月), 頁 29-31。(原用「民國」紀年)
談朱子註論語「無友不如己者」章	傅錫純	《鵝湖》9 卷 11 期(總 107 期)(1984 年 5 月), 頁 44-45。(原用「民國」紀年)
談談朱子各門人的體會分析	費海璣	《學園》7 卷 6 期(1972 年 2 月), 頁 15。(原用「民國」紀年)
論「形而上」與「形而下」: 兼論朱子與戴東原	何佑森	《臺大中文學報》1 期 (1985 年 11 月), 頁 77-90。(原用「民國」紀年)
論「隱君陸梭山先生」之行與思 --兼及「朱陸之辯」	鄭曉江	《孔孟月刊》39 卷 2 期(總 458 期)(1990 年 10 月), 頁 31-39。(原用「民國」紀年)
論孔子之知與朱子之理: 並申論知識與道德之互基性 (互為基礎)	成中英	《孔孟月刊》21 卷 9 期(總 249 期)(1983 年 5 月), 頁 3-16。(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觀書有感」詩	陳榮捷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 卷 3 期(總 7 期)(1992 年 9 月), 頁 1-7。(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小學與大學思想之義理根源	林美惠	《鵝湖》14 卷 3 期(總 159 期)(1988 年 9 月), 頁 23-35。(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之「中和舊說」	張德麟	《孔孟月刊》15 卷 11 期 (1977 年 7 月), 頁 31-34。(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之仁說	陳榮捷	《哲學與文化》8 卷 6 期 (1981 年 6 月), 頁 23-36。(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未嘗疑「古文尚書」偽作	劉人鵬	《清華學報》22 卷 4 期 (1992 年 12 月), 頁 399-430。(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宇宙論中惡之可能	溫帶維	《哲學與文化》26 卷 7 期 (總 302 期)(1999 年 7 月), 頁 665-672+695。(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倫理主義中的唯美原則 (上)	林美惠	《鵝湖》16 卷 8 期(總 188 期)(1991 年 2 月), 頁 12-22。(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子倫理主義中的唯美原則 (下)	林美惠	《鵝湖》16 卷 9 期(總 189 期)(1991 年 3 月), 頁 41-51。(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王異同	孫效智	《孔孟學報》55 期(1988 年 4 月), 頁 141-172。(原用「民國」紀年)
論朱陸異同與會通	孫效智	《哲學與文化》14 卷 5 期(總 156 期)(1987 年 5 月), 頁 55-65。(原用「民國」紀年)
論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及其現代價值	鄭曉江	《中國文化月刊》239 期(2000 年 2 月), 頁 1-19。(原用「民國」紀年)
論陽明哲學之朱子思想淵源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5 期(1984 年), 頁 1-20。(原用「民國」紀年)
論劉蕺山「心之性情」反對朱子 「心統性情」之理論根據 (上)	賴賢宗	《鵝湖》19 卷 6 期(總 222 期)(1993 年 12 月), 頁 12-18。(原用「民國」紀年)
論劉蕺山「心之性情」反對朱子 「心統性情」的理論根據 (下)	賴賢宗	《鵝湖》19 卷 7 期(總 223 期)(1994 年 1 月), 頁 34-39。(原用「民國」紀年)
論錢穆朱子學	汪學群	《中國文化月刊》187 期(1995 年 5 月), 頁 38-45。(原用「民國」紀年)
儒學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關聯初探：以象山學朱子學為例	邱黃海	《鵝湖》13 卷 9 期(總 153 期)(1988 年 3 月), 頁 25-31。(原用「民國」紀年)
儒學價值系統中的兩難式--<元 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讀後	黃俊傑	《中外文學》第 8 卷第 9 期(1980 年 2 月), 頁 100-106。(原用「民國」紀年)
戰後臺灣的朱子學	楊儒賓	《漢學研究通訊》19 卷 4 期(總 76 期)(2000 年 11 月)。(原用「民國」紀年)

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	楊儒賓	《漢學研究通訊》19 卷 4 期（總 76 期）（2000 年 11 月），頁 572-580。（原用「民國」紀年）
錢穆「論語新解」與朱子「論語集注」之比較--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等九章為例	倪芳芳	《孔孟月刊》36 卷 1 期（總 421 期）（1997 年 9 月），頁 10-17。（原用「民國」紀年）
檀島「國際朱子會議」後記	蔡仁厚	《鵝湖》8 卷 2-3 期（1982 年 8-9 月），頁 8-15。（原用「民國」紀年）
鵝湖之會與象山兄弟之詩--朱陸異同序論	蔡仁厚	《文藝復興》13 期（1971 年 1 月），頁 56-59。（原用「民國」紀年）
羅整菴與朱子思想的距離 - - 對梨洲「學案」的反駁及檢討	郭亞珮	《史繹》21 期（1990 年 5 月），頁 29-55。（原用「民國」紀年）
關於朱子「詩經」學的評價問題	黃忠慎	《國文學誌》3 期（1999 年 6 月），頁 23-74。（原用「民國」紀年）
顧亭林與黃梨洲--兼述清初朱子學	何佑森	《幼獅學誌》15 卷 2 期（1978 年 12 月），頁 60-74。（原用「民國」紀年）

（三）會議論文

論朱子的「心不即理」義	高柏園	「第五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華梵大學哲學系，2001 年 4 月 28、29 日。
-------------	-----	---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計畫之初，為先求對二程學之定位，是以先發展唐君毅先生對二程學之定位研究，以此為基礎而確定二先生對朱子學之定位，已符合本計畫之基本要求。同時，本計畫之成果亦將以論文形式發表，尚在前整理階段，此中會先有朱子對四書之理解態度之討論，由是再發表唐、牟二先生對朱子學理解之比較。

六、附錄

論唐君毅先生對二程理學之理解態度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專任教授：高柏園

（本論文已發表於《鵝湖月刊》335、336期，2003年5、6月中）

一、前言

當代新儒家最具學術文化影響力的二位代表人物，當首推唐君毅與牟宗三先生，此有所謂「唐牟」並稱。然而，唐牟雖然並稱，而且二人之間在生活及學問上亦相契甚深，唯畢竟同中又有相異之處。即以主觀氣質而言，唐先生偏仁者型，而牟先生則偏智者型。唐先生論學往往以無我為先，先去除個人之私意，而任此空靈之心以相應呈現前賢先哲之種種說，並以前賢先哲之知音自居；尤有進者，唐先生總認為人生種種論說皆有其相應之機，亦有其相應之得失與限制，吾人當同情地了解前賢之學，此方是忠敬之心之表現也。而唐先生亦願以先賢智慧相通之友自許，不必更以立己說為第一要務也。若落在文化哲學上，則唐先生時時以寬平之心廣納所有文化，並為之一一定位，使其精義能如實呈現，而唐先生對人生實存之種種感受與反省之體貼深刻，亦是新儒學諸大師中之最者。牟先生曾以「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稱之，誠的論也。

相對於唐先生，牟先生則更重前賢學問之客觀性與系統性。依牟先生，個人固然可以有種種主觀之所見與增益減損之詮釋，然而這畢竟是相對客觀文獻義理而可能，否則逕自創造自己的哲學可也，然必不可謂其善述前賢之學。就唐牟二先生皆能去一己之意，而唯客觀義理之呈現為尚，二先生固相近也。唯唐先生更重一歷史義、發展義與歷程義，由是而納入一時間優先的理解模式中展開對前賢學問之展示。而牟先生則較重一結構義、理論義與系統義，由是而更具空間性之結構之美。唯二先生論學態度之差異或可只是個人氣質與為學之取向，然落在對客觀學說之詮釋與理解上，卻也顯現出理論之分化，值得吾人留意。本文的主要目標，便是試圖通過唐牟二先生對二程理學理解態度之對比，顯現二先生之理論差異，並試為比較與會通。

二、牟宗三先生對二程理學之理解

牟先生對二程理學之理解，主要集中在《心體與性體》(冊二)，其主要之進路乃是由朱子開始。一般學界之意見，皆以朱子為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者，然而牟先生卻由朱子對二程學問之回應態度上發現此中仍有重大之區別與轉折，最明顯的例子是朱子對明道學問之態度。

朱子對伊川所說無一不視為當然而接受，然而對明道則顯有保留。其編《近思錄》便捨明道之識仁篇，而謂「渾論、太高、學者難看」，此並非朱子個人之意氣，而實在是因其整個思維模式及義理性格之差別使然也。依牟先生，伊川朱子喜做分解之表示與思考，而明道則喜採非分解之指點，朱子不喜明道之表達方式及內容，一者是因為進路之差異，另一則是擔心明道之學有近於佛教之禪宗，由是形成不必要之忌諱。雖然如此，然此仍只是隱伏之線索，較為明顯之證據，乃是朱子對明道後學之批評。牟先生依工夫格局之差別，將明道之學分為二系之發展，其一是由謝上蔡、胡安國、胡五峰、張南軒一系，其是由日常生活之體會為入道之路，屬「內在的逆覺體證」一路；其二則是由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子一系，其以「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為入道口訣，屬「超越的逆覺體證」一路，此二路雖有入路之差異，然皆本於明道之說，而正式發展出之理系也。今朱子雖未直言明道之非，然卻反對上蔡的「以覺訓仁」說，對胡五峰的「知言」則以八端置疑，對五峰的弟子更是壓制甚力。今若上蔡以下諸說皆本明道而來，則朱子對以上諸說之不滿，實即對明道學說之不契也，唯礙於明道地位顯赫，乃迂迴攻之耳。另一方面，朱子雖受學延平，然時間甚短，於延平以上之傳承未能相契則甚明。且朱子與象山論辯主題之一，便在先察識或先涵養之爭。象山主先察識而後涵養之，此則與明道之學相契，而朱子則以心為氣之靈，必待以敬涵養之後而察識之，是以反對先察識之可能。若以上所論無誤，且朱子之批評並非意氣之舉而為嚴肅之學術態度使然，則此中朱子肯定伊川而遠離明道，正顯出二程間異質性的客觀差異。根據朱子之線索，牟先生進一步展開文獻的反省。

試觀牟先生之反省：

朱子編《程氏遺書》共二十五篇，自第一至第十，程氏門人及呂與叔所記者皆原標為二先生語。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篇乃劉質夫所錄，皆明道語。十五以下直至廿五，各家所錄皆伊川語。此則已分判清楚。劉質夫所錄最可窺見明道之思理與風範。然前十篇中，尤其呂與叔所記者，若除少數有注明者外，其餘皆無法確定是誰語，則吾人對於明道思想所知者必甚少，而明道在宋儒中之地位即無足輕重者，至少亦無確定顯赫之地位。然而明道在宋儒中確有一公認之顯赫地位，亦確是一大家。若竟無足以實之者，

則何能有此顯赫之地位，亦何足以成大家而為儒學復興之重鎮？【註1】

明道在宋明理學中地位顯赫，今《遺書》中文獻所支持知明道思想不足以支持明道之地位，則應更做分析，以確認明道思想地位之根據何在。牟先生之結論如下：

凡屬二先生語者大體皆是明道語，至少亦當以明道為主。

1. 凡屬二先生語者吾人可視為二程初期講學之所發。此期以明道為主。凡確定為伊川語者，《遺書》第十五以下，始真代表伊川之生命與思想。
2. 明道心態具體活潑，富幽默，無呆氣。故二先生語中凡語句輕鬆、透脫、有高致、無傍依、直抒胸臆、稱理而談，而又有沖虛渾含之意味者，大體皆明道語也。
3. 明道語句簡約，常是出語成經，洞悟深遠。又常是順經典原文加幾個口語字，予以轉換點撥，便順適調暢，生意盎然，全語便成真生命之呈現。
4. 明道喜作圓頓之表示，伊川喜作分解之表示。朱子所謂「明道說話渾淪，學者難看」，實即圓頓表示而為朱子所不喜也。故凡二先生語中凡作圓頓表示者皆明道語也。。「一本」義即圓頓表示，此非伊川所能有也。【註2】

當文獻既已區分，則由此文獻即可分析出明道與伊川思想性格之異同，牟先生指出：

至明道則兩方面皆飽滿，無遺憾矣。明道不言太極，不言太虛，直從「於穆不已」、「純亦不已」言道體、性體、誠體、敬體。首挺立「仁體」之無外，首言「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下便認取，更不可外求」，而成其「一本」之義，是則道體、性體、誠體、敬體、神體、仁體、乃至心體、一切皆一。故真相應先秦儒家之呼應而直下通而為一之者是明道。明道是此「通而一之」之造型者，故明道之「一本」義乃是圓教之模型。【註3】

註 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二）（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2 年 2 月，台初版第 9 次印行），頁 1-2。

註 2. 同註 1，頁 5-8。

註 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一）（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5 年 2 月，第 10 次發行），頁 44。

至於伊川，

他把「於穆不已」之體（道體）以及由之而說的性體只收縮提煉，清楚割截視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不活動」的理。他把孟子所說的「本心即性」亦拆開而為心性情三分：性亦只是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亦只是理；仁性愛情，惻隱羞惡等亦只是性；心是實然的心氣，大體是後天心理學的心，心與性成為後天與先天、經驗與超越的、能知與所知的相對之二。心發而為情，心亦有兩個重要的觸角：一是後天的偶然的收斂凝聚，由此說敬，說涵養；一是心知之明，由此而說致知格物。【註4】

由以上引文可知，牟先生首先區分了文獻之差異，由是再根據文獻做客觀義理之分析。明道之所以在北宋理學中地位如此顯赫，並非只是語錄中之神來之語所可充分說明，而是明道所展示之境界，乃是一主客觀皆充實飽滿之圖教系統，以此圖教系統之確立而支持其在北宋理學中獨有之地位。然而也正由於明道專顯境界之圖融，因而分解即非此系統所重，而朱子又正喜分解性之展示，是以朱子對明道之學始終不相契，亦可由此形式上得到部份之說明。至於伊川，則正式有義理之轉向，此中之關鍵有三：首先是伊川對道體之理解，順其分解然與所以然之進路，將道體靜態化，道體成為靜態的「只是理」，而缺乏「感而遂通」的創生義與動態義。其實，當伊川強調道體的超越義與存有義只是道體之一義加以強調，此並不能說是錯誤，而可以只是說法之強調罷了。然而，當伊川在不自覺地強調道體的存有義與超越義，而逐漸遺忘道體的創生義與內在義，則便是以偏義蓋全義，由是而形成與自先秦孔孟儒學以至北宋前三家濂溪、橫渠、明道之學，有一基本義理上之差異。由於道體理解之偏差，連帶著對性體與心體之理解亦形成轉折。伊川由《中庸》中和說而分解心性為二，性是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不動者，是天下之大本所在。而心則屬氣，是喜怒哀樂已發之內容，是具動態義的。由於性是理而心是氣，是以心性為二，如理氣之為二。今心與理既為二，則心所發之情即不必保證其必然為善，因為氣本身為非理性之存在，不必有道德上之定向也。今若欲成就道德之善，則心必要能合於性、合於理，始能使心所發之情皆中節合宜。而使心能如此則有賴工夫為之，此即伊川涵養用敬與格物致知之說。就伊川而言，心之所以能發而中節，乃須先有一以敬涵養之工夫，由是而使心能因敬而正，是能發而中節。同時，吾人喜怒之發乃是對物而起，是以若欲發而中節，除心由敬而正之外，亦要能如實掌握事物應然之理，由是而使此發更能保證其中節合宜，此即將工夫重在《大學》的格物致知。由道體的然與所以然、形上與形下之區分，性即理而心為氣之區分，涵養與格物致知之工夫，凡此無一不顯一分解之進路，此即構成

註 4. 同註 3，頁 44-45。

伊川思想極重要之特色，而特為朱子所繼承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二程之區別不只在分解與非分解之區別，而更在道體、性體、心體及工夫論之差異，而此差異又不只是二程之差異，而更是伊川與整個儒學心性是一的大傳統相異，由是而支持了牟先生對宋明理學之分系。此即傳統之二系：五峰巖山系與象山陽明系，以及非傳統的伊川朱子系。牟先生之分系不只是分系，更重要的意義乃是清楚地分判了二程區別，以及朱子應有之地位，由是而還原出宋明儒學發展之真實面貌，此中，二程之區分正是十分關鍵的問題所在。

三、唐君毅先生對二程理學之理解

唐先生對二程理學之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此外，《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亦論及二程論性之異同。首先，唐先生自覺地對其論述方式提出說明：

至於就此書之論述方式而說，亦與原道篇之為「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方式無殊。所謂即哲學史以論哲學者，即就哲學義理之表現于哲人之言之歷史秩序，以見永恆的哲學義理之不同型態，而合以論述此哲學義理之流行之謂。既曰流行，則先後必有所異，亦必相續無間，以成其流，而其流亦當有其共同之所向。【註5】

易言之，哲學之發展乃是在時間中展開，因而必有其歷史性、歷程性與發展性，此中整個思想發展宜以一整體觀之，而後乃能據此整體加以定位，並由此定位知此種種思想論述之所對、所及、所得以及所失。然既是在一相對之定位下而有種種之所對、所及、所得、所失，則當定位加以轉變之時，種種之對、即、得、失亦相應而轉變，由是而為一相對而非絕對，此亦正可使吾人知條條大路通羅馬之義，以全體通觀種種思想，避免不必要之僵固與偏執也。此唐先生云：

依吾平日之見，嘗以為凡哲人之所見之異者，皆由哲學義理之世界，原有千門萬戶，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間，周旋進退，還當相遇；則千門萬戶，亦應有其通。故今本歷史秩序，以論此宋明儒學中哲學義理之流行，亦當觀其義理流行之方向，如何分開而齊出，又如何聚合而相交會；不先存增益減損之見，以於同觀異，於異見同，方得其通。然後得於此哲學義理之流行，見古今慧命之相續。故此觀同異之事，宜當循諸儒思想之先後衍生，而

註 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9 年 9 月，全集校定版），頁 9。

次第形成之序，由原至流，再窮流竟委，以觀之。【註6】

依唐先生，哲學進路及其理論誠可有多端，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亦物也，是人亦不齊也。夫人既不齊，則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亦不必齊，而其對真理之理解與展示亦不必齊，由是而有種種說與種種論。今此種種說與種種論雖乃相應人物之不齊而起，如《莊子·齊物論》之「萬竅怒吼」，然皆應風而起，亦即是回應真理而後有者。因此，此種種說與種種論雖不免「一曲之士」之偏，然亦乃全中之偏，是仍有全者之義在也。此全者無他，正由此種種全中之偏加以契會，而人間世之種種說與種種論以其為全中之偏，以其為契會道術之全之不二法門，是以無一說可去，無一論可廢，皆應予以合理之安頓，此亦〈齊物論〉之精神所在也。唐先生即據此義而通觀宋明儒學之發展，而以一整體通觀之方式予以一一定位，以還其應有之價值，並藉此整體形成一相通相成之郵，以通百家之學於無礙之境也。此義既明，則知唐先生在論及二程理學之時，便不同於牟先生予以明確之系統判定，而是以一發展之歷程，說明二程思想之所以如此之理由，由是而知彼此知所是所非，進而得到最後之安頓也。

行文至此，吾人仍可有一後設之問題可問：唐先生此種方法本身是否亦有其限制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唐先生云：

至於吾書之限極，則吾亦自知之。此論述之方式本身，即為一限極。吾有所論述，亦必有所不論述，此亦成吾書之限極。此皆顯然易見。若剋實言之，則吾之論述宋明儒之每家之學，皆只提示吾所觀為有較特殊之承先啟後之哲學意義者為此。然一家之學，固不以此而止也。要之，學問無窮，義理無窮，加以合觀，以為守約之資。【註7】

顯然，唐先生之論與牟先生之論不同，唐先生以哲學史之歷程義與發展義為重，而牟先生則以系統理論之建構加以著力，此不同亦可無疑。唯經由不同進路而得之結論又有相反之時，便需有一後設之反省，此即本文最末所欲完成者。此外，牟先生在論述二程時，首先便對文獻問題加以反省，而唐先生在此則並未嚴格討論，只是附帶及之。試觀唐先生對二程文獻之說明：

1. 又遺書中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遺書·二上》，此語當初為明道所說）。【註8】

註 6. 同註 5，頁 10。

註 7. 同註 5，頁 11-12。

註 8. 同註 5，頁 126。

2. 故謂「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不可更外求」。此語見遺書二先生語，蓋明道伊川所同契，然當是發于明道。【註9】

3.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遺書·六》，二先生語，《宋元學案》定為明道語）。【註10】

4.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遺書·五》，二先生語）此語可為伊川說。【註11】

5. 蓋遺書中凡將敬義之合內外，與浩然之氣之塞乎天地相貫而論者，皆初當是明道語。蓋此明道之言，皆神來之語。昔張橫渠謂「合一不測為神」，「神為不測，緩辭不足以盡神」。今愈分析講解，則愈成緩辭，或愈不足盡此中之神。此中之義，須直下悟得。然學者能將明道之言多玩誦數次，皆可有所悟，即是一籠統混淪之一悟，亦可開人之神智也。【註12】

6. 其言「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遺書·四》，二先生語，此乃明道伊川共許之義。）【註13】

7. 大率《遺書》中所記為二先生語者，蓋皆明道伊川所共說，或記者視為二先生所共說者。《遺書》中所記為二先生語者甚多，則二先生之同處固甚多也。【註14】

唐先生在此分別隨文指點文獻之誰屬，並且提出較為普遍性的論斷，此即以《遺書》中論及義敬合內外與浩然之氣貫通言之者，皆視為明道語，同時，由於明道特顯此一本之無分別，此圓境必須用神來之語之非分解說，方能盡此中之精神，所謂「神為不測，緩辭不足以盡神」。此義與牟先生之論大體相合。唯唐先生又以《遺書》中所記二先生語當為二程所共許之義，由是而指出二先生之同處固甚多也。此即與牟先生之意見相距較大。依牟先生，《遺書》中二先生語應大體屬明道，此時伊川之獨立

註 9. 同註 5，頁 129。

註 10. 同註 5，頁 145。

註 11. 同註 5，頁 147。

註 12. 同註 5，頁 148-149。

註 13. 同註 5，頁 153。

註 14. 同註 5，頁 164。

性尚未顯也。明道早熟，而伊川之獨立性乃是在明道過世後，伊川獨自講學後，始開始逐漸浮現，而其與明道之距離亦由此可見。果如此，則吾人可說，唐先生乃是就二程早年共同講學時之共同性而說其相同之多，而牟先生則對比著伊川晚期獨立講學之內容與二先生語之差別，而論斷二程思想性格之差異也。至於牟先生認為二程較為明顯而重要之分歧，在唐先生則以發展視之，並仍主張二程思想並不具有決定性的異質性，此唐、牟二先生對二程思想理解最大的不同所在。

如果吾人依牟先生之說法，則宋明理學之發展主要是圍繞著五本書，此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易傳》，而其中之次序，乃是由客觀之天道性命入手，亦即是由《中庸》、《易傳》入手。例如周濂溪之《通書》與《太極圖說》，即是以《中庸》通易，而《太極圖說》則重天道性命之貫通，畢竟較顯客觀天道之尊嚴崇高也。至於橫渠之《正蒙》以太虛為言，亦是重天道變化之意，此見宋明儒學開始之客觀義較重之事實也。即至明道則主客觀二面皆飽滿而為圓教規模，至於象山則純為孟子學，陽明則兼《孟子》與《大學》，而朱子則尤重《大學》。此牟先生簡要之分判內容所在。

今唐先生論二程則仍以其「即哲學史以言哲學」之立場，重新說明二程學之特殊性。首先就明道而言，唐先生以「無內在徹上下之天人不二之道」為題，此義與牟先生所謂「圓教規模」其實是相通的。蓋圓教無他，即是能安立一切法之價值與意義也。今能無內外人我之別，而通天人不二之一大圓境，自是圓較規模之表現也。試觀唐先生之言：

更記橫渠之言窮理、盡性、至命，「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此即明以橫渠之窮理、盡性、至命有次第之說，為當改。【註15】

此文明顯指出明道已然不再如橫渠做一分解性之展示，而企圖超越此分解，由是更貼近生活實踐之內容，實即是道之更具體之內容。而橫渠之所以採此種進路亦非無故，此即是由客觀義來體會聖人之學也。此唐先生謂：

大抵二程與濂溪橫渠之學之不同，在二程全不取「觀乎天地，以見聖人」之路數。邵康節明謂其作《皇極經世》，由「欲知仲尼，當知天地」。濂溪橫渠，同不免此意。【註16】

註 15. 同註 5，124-125。

註 16. 同註 5，126。

仁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成己成物，此見聖人境界意義之無限，因此，吾人亦可由天地造化之無盡，體會聖人化境之無限，此「觀乎天地，以見聖人」之義亦非不可有之義也。然而，二程在此之所以不採此路數，乃是因為天地之有造化無盡初可只有一事實義與實然義，蓋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無心不必是去己去私後之無私心，亦儘可只是一自然而已，此中不必有如此甚深之價值與意義在也。今吾人若欲由天地之化中體會聖人生命之無限，則必先要有充分之道德修養與體驗，方能由個人生命之價值以回應此天地之價值。易言之，必要有個人之道德基礎，方能真正證成天地之價值義，由是才能再由天地之價值說明聖人境界之無限也，此中之次序並不可隨意更動。當然，吾人不能據此而謂橫渠之說為非是，因為橫渠雖然由客觀之天道而言聖人境界，此亦可以是為學進路之差異，也就是先預設了個人之修養工夫與境界，而後有此種種客觀之描述也，而牟宗三先生就說橫渠主觀面亦不弱也。只是橫渠客觀義之展示較強，而使人易忽略此中之主觀義也。問題是，由客觀面之分析入手固為一義，然亦有其特有之方式與型態，此即較顯一客觀理序、概念、結構之架構，因而相應之分解性尤強，此唐先生曰：

橫渠之書，欲于此中之天人、神化、誠明、仁義、性命、內外之名義，一一分說，而使之各有界分，則為文不可不謹嚴。然欲謹嚴，則不能無苦心極力氣象，而多考索之功，亦缺寬裕溫和之氣。其欲使此諸名義，各有界分，而相限，則人循名之舊義，以觀其義者，則自將覺其多有出入，而見其多所滯礙，說義理似生而不熟。【註17】

其實，「義理似生而不熟」乃是分解表示必有之型態，蓋生命境界原本無礙，今硬是要以種種區分加以展示，自然不免有方便分判之不得已，而此方便與不得已正說明其與圓境之距離，亦令人有「生而不熟」之感也。若就另一角度言之，則吾人生命之學若欲以一理性之結構加以客觀展示，以求可大可久、客觀不移之效，則此「生而不熟」之過程亦成必然。當然，吾人亦可暫時不以此客觀結構之分解為著力處，而逕自以此圓境之不二以為言，以此克服此分解說之「似生不熟」之病，此即明道「不二」之道之所以提出也。試觀唐先生之言：

又可說凡界分之物，其界分，皆一方所以成其別，一方所以見其通。如二田邊之界，即通此二田地者也。故凡可依界分以成別者，亦可依界分以成通。則表學術之義理之名言，可各定其界分，以成別者，亦無不可更緣此界分之理解，以更觀其通。既已通矣，則界分即泯于此通之中。如橫渠既已言天與人之別，更言人能合天以成其通。則人亦可剋就此人既已合天，更無天可合，

註 17. 同註 5，127。

而直下會此天人為「一而不二」，即不須先由二以成此合與不二矣，今于橫渠所言之一切義理之相對成二者，皆作如是觀，即成另一思想言說之道路。此正為明道之所循之道，而伊川初亦承明道而行于此道者也。【註18】

依唐先生，界之所以分，亦界之所以通，是以明道即可依此分別而一一通合之，此即為明道學之特色，亦為伊川早期所行之道。然而，伊川晚期何以又與明道不同呢？關於二程之差別唐先生亦嘗如是分別：

然伊川與明道之氣質固不同，其學皆各求其心之所安。【註19】

此伊川所論義與明道之不同，或謂在其言性有才與性之別之說，如其《遺書》十九中各節所說。【註20】

此外，伊川與明道論學之不同，則蓋在伊川于此學中之種種名義，更有分別肯斷之論述，不同于明道之多指點啟發語，朱子所謂「言多超邁」（《語類·九十三》）者。【註21】

以上二程之差別皆是合理之論，然而就理論意義言，則更有他義可說，此即明道之不二之道，乃是以一聖人之圓境為基礎而展示之體系，然就現實人生而言，人之克己與否？中節與否？此中仍有種種上下之可能，不必一定復禮中節也。此即性與情之間之表現關係問題。唐先生指出：

上言此所謂性其情，即使其情皆為其仁義禮智信之性之表現。此事並非人人皆能作到，即見人有不表現于情之性，而見此情與性之有分。又即在人性之能表現于情處看，亦非此情能將其性之全體，加以表現。其所以不能全體加以表現，不只由其表現之不純，而有不善之情欲之夾雜；而兼由：一至純粹之情，而能表現此仁義禮智信之性者，亦未必能同時表現此五性，而恒在一時只表現其一性；又在其表現五性之一，如仁時，亦不能窮此一性之可能有之表現，而表現此仁性之全。如人已有至純粹之對人物之愛，此固能表現此人之仁性。然人之此愛，固不足以盡此仁性所可能有之表現，其及于其他人

註 18. 同註 5，頁 128。

註 19. 同註 5，頁 162。

註 20. 同註 5，頁 165。

註 21. 同註 5，頁 165。

物者，即不能表現此仁性之全也。【註22】

此情之內容與性之內容恆有距離，此即為工夫義之所在，亦為伊川學之重點所在。依此，是以已發未發、中和問題、心統性情、格物致知、心體性體等問題，在伊川便有另解，由是而造成伊川晚期與明道思想之差別所在。然而，此差別只是在一發展歷程所顯重點之不同，並非二程有本質上之排斥與衝突，也因此，唐先生便不似牟先生將伊川朱子別列一系，並以歧出之「繼別為宗」說此系之特色也。易言之，唐先生以二程為同質之發展，因而並不造成二程在分系上之差別。此亦即唐、牟二先生對二程思想理解之主要差別所在。

四、唐先生對明道思想之定位

唐先生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中，以「無內外、徹上下之天人不二之道」做為明道思想之總綱。以不二為重，與牟宗三先生以明道為圓教之論有其相似之見地。然而以唐先生「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進路，則又對此不二之道給予一思想史之說明，此即明道與濂溪、橫渠思想之對比。唐先生指出：

大抵二程與濂溪橫渠之學之不同，在二程全不取「觀乎天地，以見聖人」之路數。邵康節明謂其作皇極經世，由「欲知仲尼，當知天地」。濂溪橫渠，同不免此意。【註23】

由天地知聖人，即是由一客觀之路來加以掌握聖人之境。蓋聖人之境雖由吾人之修養工夫所致，然而此境亦有其客觀之理，是以由天地之無外，亦可方便體悟聖人仁心之無外也，此亦非不可有之論。唯既重客觀義之展示，則此中種種層次、界分之分別便成重點，而此分別又必須在一嚴格之分解下展開，是以難有寬裕溫和之氣，而顯苦心極力之象，此唐先生云：

橫渠之書，欲于此中之天人、神化、誠明、仁義、性命、內外之名義，一一分說，而使之各有界分，則為文不可不謹嚴。然欲謹嚴，則不能無苦心極力之象，而多考索之功，亦缺寬裕溫和之氣。【註24】

今既不以「觀乎天地，以見聖人」為入路，而轉以「觀乎聖人，以見天地」，則問

註 22. 同註 5，頁 172-173。

註 23. 同註 5，頁 126。

註 24. 同註 5，頁 127。

題重心便不必在客觀義理之種種分解，轉而重主觀義之心性工夫之論，此即明道有〈識仁篇〉、〈定性書〉之作也。而且在明道，尤重將此種種分解所帶來之相對成二，皆視為第二義之存在，而可在種種不二之論中一一掃除，而當下見此天人、內外之一本無礙也。依橫渠，「觀乎天地，以見聖人」，固重客觀義之分解，然而此種種分解又畢竟屬聖人一體之境界，是以此分別仍須「一之」，而橫渠亦自有其「一之」之道。唯在明道，則直接越過此種種分解，徑以不二之道示之，由是而是以橫渠學之終點為其學之始點矣，此唐先生謂：

如橫渠既已言天與人之別，更言人能合天以成其道。則人亦可剋就此人既已合天，更無天可合，而直下會此天人為「一而不二」，即不須先由二以成此合與不二矣。今于橫渠所言之一切義理之相對成二者，皆作如是觀，即成另一思想言說之道路。此正為明道之所循之道，而伊川初亦承明道而行于此道者也。則此程子之學無論其自覺不自覺，吾人皆可說之為乃以橫渠之學之所終，為其學之所始，而轉以疑橫渠之學之所自始者。【註25】

唐先生以其「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方法，首先說明了二程學與其前橫渠學之關係，此中尤其指出明道之不二之道，乃是翻轉橫渠以來之分解所成之種種相對之二，而直以一體、一本之無二為始點，由是而徹底消解由分解所帶來之種種理論夾雜，例如有名的〈定性書〉便是十分明確的例子。然而，此中仍有一理論問題有待回答，蓋橫渠之學雖立分解而有兩兩相對之對立，但是橫渠正是希望通過此相對之二之對比，以顯太虛神體兼體無累之勝義。因此，橫渠學自身之分解仍能通過其理論而加以合一，此不必待明道而後可也。反之，明道伊川對橫渠清虛一大之質疑亦未必中肯。例如〈遺書十一〉記：「謂清者神，濁者非神乎？」依橫渠，以清、虛、一、大言神之無礙，由是而能成就一切陰陽氣化之內容，清者無執也，能兼體無累也，此與物之濁、執而不通，顯有不同。若就圓融之境而說，則一切物皆在神體之無執下是其所是，則一切物亦神體之所在，則說「濁者神」亦可也。由此看來，橫渠學自有其體系，有其分解之始教，亦可有兼體無累之終教，而二程以終教疑始教則只能視為方便，未可執為定見也。同時，一貫以終教之圓境為論者是明道，其後之伊川則亦重開分解之路，此則見明道圓教之論固為當然，然亦不可廢分解以供鈍根者有一工夫把柄可循也。

即就〈定性書〉而言，橫渠以存神為要，亦即如何在外物之感通中，不失其清虛一大之活潑神用，是以此工夫亦在「如何不為外物所累，以失其定靜」上。此見橫渠「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乃是一真問題，唯此問題衡諸《正蒙》亦非不能回答。蓋由《正蒙》「心能盡性」、「以心著性」之說，皆能就心之時時盡其應有之義，便能

註 25. 同註 5，頁 128-129。

持續其神用於不斷，此即可充分回應以上之問題。至於明道之回答，則並未就橫渠之思路予以回應，而是以其不二之道加以消解。試觀唐先生之說明：

然觀明道之在定性書之答橫渠之問，則明以橫渠之只求內自定其性，以求去外物之累為非是。亦即以其只求存此神之虛而清通之工夫為非是。其所以「非是」，在其先有此內外之對待。則此內之應外，即是牽己而從之。既是牽己以從外，則外亦還累內。今于此欲去外之累，則外之來至內者無窮，亦永不能保證此內之長能定靜。是即謂有此內外之對待，即不能成就此定性之工夫。而此定性問題，亦無解決之道。唯有忘此內外之對待，此問題乃可不更生，而自然解決。【註26】

明道之回答固是一答，然亦非唯一之善解。首先，明道乃是以其不二之道回應，此中並未相應已然分解之橫渠思想之問題。分解不必究竟，然亦不害其為可有之方便，既是可有之方便，則必有其相應之意義。是以真正之善答不必只是以另一形態之思想取代之，反之，亦可就其已有之思想予以疏通。其次，明道此答似乎只是取消問題而非解決問題。蓋不二之道誠如前論，乃是橫渠學問之終點而非始點，橫渠之問題不在此終點如何，而在如何由始點以至終點，今直接以終點相答，則其只是取消問題，而非真正解決問題也。再其次，橫渠學重分解固有其工夫問題，然明道以圓融不二之道為教，亦仍有其相應之工夫問題。橫渠之問題在如何能定性，以免外物之累，而明道之問題即在如何使人能有此一體之感，如何能當下一之而兩忘？此皆非易事也。總之，明道之回答不可謂是一決定性之善答，而有其理論系統之相對性問題存在其間。唯吾人亦正可由明道之回答，而見明道思想之用心所在，此即重此不二之義，由是而凸顯一非分解的圓融之教也，至於其工夫，則可分消極與積極二義展開：

此明道之言內外兩忘，乃消極說。至于積極說此內外兩忘之境之內容，則在聖人，只是以心普萬物之心，情順萬事之情。此心此情，即明道所謂仁。【註27】

依唐先生，明道工夫論之核心即在無二之道，此無二即在無我與彼之對待，亦即無小我之私，而後乃能內外兩忘。唯此內外兩忘只是消極地無我，至於積極之內容，則在以此無我之心普順萬物而已。此內外兩忘與普順萬物而無外，即成為仁的主要內容所在，亦為明道學問之所重：

註 26. 同註 5，頁 133。

註 27. 同註 5，頁 137。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識仁篇）

渾然與物同體，即是一無二之道的具體展現，明道要學者先識仁，即是先肯認此與物同體的不二之道。今吾人或可更問：吾人如何識仁？則明道嘗有「觀雞雛可以觀仁」之說，即是說明此仁心之同體乃一當下之呈現，亦時時之呈現，如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自然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見孺子與我之無二，今更推擴此義，則萬物皆備于我，而渾然與物同體亦非難知之事矣。唯既已識仁，則當有工夫存養之，一如孟子之存養擴充以言良知教，明道則以誠敬為重心。良知之呈現乃當下如是，而我則如是肯認，此中唯一真實無妄之感通所在，此即誠也。既有此誠，當更使此誠能連續不斷，是有敬之工夫，所謂「敬則無間斷」，而能充分接續此識仁之境也。此明道謂：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嗚呼丕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遺書十一》）

誠敬在人，是以明道乃是由聖人之誠敬體會天道之無二也，同時此無二亦是一永續之歷程，是以不已、不間斷亦成必然，由此可見誠敬在明道學中之重要性。明道又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外書二》）

忠者，誠敬而已，唯其誠敬如此，乃能善體不二之道，是而能順成天地變化，草木蕃盛。雖然忠恕乃仁之一以貫之之道，然此處仍可方便說忠乃以誠敬求內，而恕則以普順萬物而為外也。相應於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成為明道十分重要的工夫原則所在，此亦為唐先生所盛言：

此明道喜言敬與義，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取諸易坤卦文言傳。【註28】

又，

然明道之學，明以定性識仁為本，緣是而更特舉敬義、忠恕、忠信之下學之事，為入道之門。蓋人之敬義、忠信、忠恕之事，實亦即人之通內外、無內外，以定性識仁之事，而分內外二面以言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即一心之兼應內外之二面之事，而通內外之事。敬以直內，即明道定性書所謂內之

註 28. 同註 5，頁 147。

廓然大功之無間斷。義以方外，即定性書之物來順應。合此二者為一心之兩面之功，即開此定性之一功為二。【註29】

< 定性書 > 謂：「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然此普順亦非如同佛道之普順，此中儒者之別，即在此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充分顯示一道德意識。蓋敬義皆為一道德概念，而儒者之普順乃是以天理之大公為前提，由是而有其道德的理想主義之情調與立場。其次，< 定性書 > 盛言物我兩忘之不二之道，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更是回應此兩忘之不二，而必須以此內外之兼通無二，方為工夫之實處。果如此，則明道亦非完全以圓融之教為起點而已，其亦有相應之工夫為之基礎，而此工夫亦可方便區分內外而以敬義貫之也。此一方面說明明道答橫渠分內外之非是固是一義，然畢竟非決定性之回答，以明道亦有敬義內外之別也。另一方面，則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論，亦直接影響伊川朱子，而有格物致知之回應也，此唐先生云：

此人之成其當前道德生活之事，在依心之知當然之性理，以形成其心情與心氣。此性之見于情，理之見于氣之工夫，則在伊川有二語，即「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為後之朱子所奉為圭臬者。此二語，則由其承明道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之說而成。【註30】

由以上引文可知，明道雖以天人物我不二之道為立言宗旨，然其又畢竟要對治人之為二的情形，由是而有其誠敬之工夫論。唯明道雖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論，則敬以直內既是個人之反省，自可當下即是，唯義以方外則涉及外在事物之種種內容，此非當下自反所可完全解決者，是以伊川朱子則更在此著力，而以《大學》之格物致知論，以補此中之不足也。此一補足，似乎又回到橫渠分解之路中，自然亦可引致如象山陽明以不二之道為立場之批評，持平之論，應是將分解與圓融置於一互動互補之辯證歷程之中，如是乃能去一偏之執，而兼顯方便與究竟也。

五、唐先生對伊川思想之定位

如前所論，伊川乃是依明道不二之論為基礎，再就其「敬以執內，義以方外」之工夫論加以深化，由是而以一分解之方式補充明道在工夫論上之不足。果如此，則明道伊川表面之差異即非決定性的，而只是表述重點之不同而已。易言之，明道雖盛言

註 29. 同註 5，頁 149-150。

註 30. 同註 5，頁 191。

一本，尤重天人物我之不二，然其亦必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分別說，以充分回應吾人現實生命之種種內容。唯其重點畢竟以此不二之道為重，是以一般人往往因此忽略其亦有之分解說也。反之，伊川誠然以理氣、性情等分解為重，然其根本仍在此天人物我之不二，一如明道之立場。唯因其分解重，是以使其不二之道不為人所重也。此唐先生云：

而後之學者，于伊川朱子之學，唯重其「由性見理，由情見氣，性情理氣，相對而成二」方面；而不重其以心為所主處之義，遂忽視其分性情、寂感，乃于一心分二面而開出，其所承者，正是明道之言整個一心，亦原有其內外二面之說。由于不明此中思想發展之跡，遂橫將明道伊川兄弟相承之說，化作對立之二論，而亦使此宋儒之學中之道之流行，若有間斷無相續矣。【註31】

唐先生貫徹其「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立場，而就思想史之發展認為伊川並非表面所見，為一性情、理氣二分之二元論，而仍是依明道思想而後有之發展，因而兄弟之間只有論述重點之差異與補充，卻並未有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之歧出轉向之問題。唯唐先生如此說必須要先合理地說明伊川思想中明顯而又強烈之理氣二分之內容，而唐先生在此乃是以性情二分為前提，再說明理氣二分非第一義之區別，乃是性情區分下的產物，因而性情既屬一心，是以理氣之分別亦不必判然為二元，而僅可是一心之兩端，由是而消解伊川二元論的嫌疑。此唐先生云：

至於欲對伊川之言性即理，有一切當之講解，則當知此所謂理，即吾人今所謂當然之理，亦即義所當然之理。然觀伊川思想之重點，則當是先有此性情之辨。故伊川亦多言性情之相對，而較罕及理氣之相對。如伊川易傳以乾坤為天地之性情，亦尚不以理氣說天地，是其證也。自伊川既辨性情，更及理氣，方有此理氣之論；朱子遂大張此理氣之論。故自思想史觀之，此理氣之論，固起源于性情之論。性情之論，則源于人對其道德生活之省察，亦對於其心之性情二面之省察，而初非源于對天地萬物理氣之省察者也。【註

32】

唐先生此論十分重要，蓋宋明理學之本質即在一成聖成德之學，是以性情之辨遠較理氣之辨為重要，而理氣之辨當是性情之辨其後在說明一切存有之存在價值及意義時再開出之論，易言之，理氣論乃是第二序的，其必須以性情論為其基礎，方不致落空也。觀乎明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則人之所以要以敬義自持，乃是因為

註 31. 同註 5，頁 167。

註 32. 同註 5，頁 174-176。

吾人在日常生活之中，誠有不直、不方之時也，此時吾人之性淵然常存，而之所以不方不直，正在情之未能發而中節也，而此性即理之所在，而情乃氣之所存，由是而由工夫之要求，進而有性情之辨，再有理氣之論，此即唐先生對伊川理氣論之理解態度所在也。尤有進者，此理氣論必先預設性情論，亦有其理論上之必然，蓋若理氣論單獨而論，難免獨斷之嫌，亦未能在諸多有關存在之形上學說明中獨具優先之價值。此唐先生云：

是見直接為求說明已有現有之事物之所以可能，或此事物之氣之流行之所以可能，而說有一形上客觀之理，乃可說而非必可說，亦非必然之論者也。然吾人如能轉而在人之性之表現于人之道德生活上著眼，以言此理氣之問題，則此中可見人之情氣，必有一性理為其所以可能有之形上根據。【註33】

易言之，理氣論若單獨提出，則其只是諸多形上學理論之一支，此中並不見其有何殊勝與必然。然伊川以理氣為論，必有其所以如此之依據，此依據即在其由道德生活之反省而有之性情論，進而有其理氣論也。今性情既是依道德生活而體證，而理氣又是依性情論而展開，是以理氣之理便不是一事實之理，而是一當然之理，義所當然之理也。今謂性情之辨乃由一道德生活中加以反省而致者，此尚嫌空泛，若就伊川而言，此道德生活亦是針對明道所重之天人不二之道展開。蓋天人不二之道中，此中人之情與性乃是一而不二者，此自是一無上之圓境，如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然人畢竟有其為二之時，而此圓境亦非人人當下能致，即使能致，亦難如顏回之三月不違仁，是以此中情與性之間恆有其不一之可能，此即為性情之辨之根源所在。此唐先生云：

上言此所謂性其情，即使其情皆為其仁義禮智信之性之表現。此事並非人人皆能做到，即見有人不表現于情之性，而見此情與性之有分。又即在人性之能表現于情處看，亦非此情能將性之全體，加以表現。【註34】

由此看來，情性之本一自是可說，然而就吾人之現實生活而言，則情之動未必皆能發而中節，皆如禮合道也。果如此，則見性情之一固是一義，而性情之辨亦是一義，不可偏廢也。今明道當是重性情之一，由是而一本無別，唯此亦非人人可及，是以伊川則更就此性情之不必為一處，辨此性情之異及其相應之種種工夫也。易言之，伊川並非以二元論之立場分判理氣，而是以一於心之性情，方便區分理氣為二，以便工夫更有進程之把柄可握也。此唐先生強調：

註 33. 同註 5，頁 177。

註 34. 同註 5，頁 172。

于此人即感在上之性理，不能實顯于在下之情氣，而形成一心靈中上下相持之緊張關係；而于此關係中，見得理與氣之分離，性與情之分裂，如相對峙為二物。在哲學思想中，人即可持一理氣、性情之二元論。然此中之上下相持之緊張關係，只在一心靈中。則此二元論，又實不能立。伊川之言性情、寂感、理氣之原始義，乃在一心之兩面言，則亦初無證謂其主此二元論。故在說之為二時，既必有當然之性理之顯于心，更必有心之感知已有情氣之尚不足顯此性理。今若無此心為統，則理氣性情之二，亦即在此人之道德生活中，為不可說也。【註35】

此中，唐先生特別標出心之重要，由心之統性情、通理氣，乃能真實成就一道德生活。而此心既能統性情，通理氣，當是一超越之心，因而亦當是「道心」：

能知此天理之吾心，則伊川承明道之旨，名之為道心。故曰「道心，天理」。道心亦即呈現此天理而與天合一之心。對此中之二元，唯有賴他人之心之自顯其性理，或賴吾人對他人啟迪教化之功，以使其「心」，自顯其性理，以為其情氣依其性理而生之必須條件。此中若無此心為性情理氣之統，則此他人之性情、理氣，仍不得而通也。【註36】

伊川分情性為二，用以說明人之所以為不善，乃在情之發之不必合于性，不必皆中節達道，而修養工夫則落在使情皆能合于性，所謂性其情。此中，工夫之動力當來自心，是由心來統攝性與情，此所謂心統性情也。心雖為性情理氣之統，然而此心是否能常保其為道心，而不被情欲所遮，此則有賴心之工夫，此即伊川「涵養須用敬」之所從出。易言之，伊川在此依然順其兄明道之理路，重誠敬之教，由是而有「涵養須用敬」之工夫以治心也。然而另一方面，吾心雖已能平治，然而此平治之心在面對種種不同之情境，究竟應以何種方式回應方為恰當，此則不僅是心之動機之純正而已，尚包含此種種情境之種種理，必也能掌握此種種理，方能如實回應當下之境所含之理也。是以除了「涵養須用敬」以治心之外，尚須「進學在致知」以知種種理，此即轉向《大學》格物致知之說矣。此唐先生云：

伊川之學，一面謂涵養須用敬，一面謂進學在致知。用敬即大學之正心誠意之事，致知即大學之格物致知之事。故伊川之學重大學。然此亦由明道之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而來。然有時是物當喜當怒之理未明，則吾人之如何順應方合義，亦不明。于此便須窮究其理，然後吾人應之之事，

註 35. 同註 5，頁 183-184。

註 36. 同註 5，頁 185。

乃能物各付物而合義。合義而後心得所止。此即與主敬之主一無適之工夫，可相輔為用者。【註37】

簡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乃是伊川對明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之另類表述罷了。且伊川更深入情境之多元，由是而重格物致知之教，此則與明道之簡易之教有所不同矣。雖有簡易與深入之差異，然兩者皆重由此二義而合內外之道也。至於敬與致知之間，仍當以敬為優先，蓋吾人之所以致知，乃是因欲完成吾人之德性生命而致知，是以非空頭地致知，而是以敬為先的致知也。同時，此致知所得之理，其後仍當由敬心加以抉擇實踐，是以敬仍較致知為優先也。此伊川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也。然而，唐先生認為，整個伊川學其主要遺留之問題亦在此。當伊川說「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乃是一應然之狀態下說者，而在事實的致知過程中，其仍有可能與敬為二之發展。何以故？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原是一心之用，是以仍當是合內外之道者。唯當吾人以致知為重之時，即有可能暫時遠離涵養時之敬心，以致知格物並不以敬心為條件也，反之，吾人可能正是在暫時遠離敬心之下，而進行格物致知。果如此，則此中致知與敬之間便存在一種緊張，亦即致知可能正是敬心之異化與自我否定的可能。今欲免此致知之異化與自我否定，則仍有賴吾人更誠其敬心，並以此敬心安頓此致知以免歧出，此即所謂「發而皆中節」問題，亦即中和問題之產生也。其實，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言，應可回應中和問題，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當可以敬涵養之，即其已發，則可以格物致知之理應之，似乎亦不可不謂為一回應之方式。唯伊川在此似乎又受到其理氣之分及已發未發之別等之影響，態度反就後天之已發上著力，而失卻對先天心體之涵養可能，此唐先生云：

大率在伊川意，凡言心皆是自心之已發，或心之動之表現于思與喜怒哀樂等上言。至於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或心無思之時，則無工夫可用。工夫只在已發上用。故敬亦是心之已發上事。在其門下之蘇季明、呂大臨，則意謂在心之未發之時，亦應有工夫；否則不能對治心之不合理之思慮等之發，于其未發之先；亦不能開出此內心之性理，自然表現為中節之發之道路。【註38】

又，

要之，伊川之學之進一步發展，自可引起此在心之未發之際有無工夫，心有無未發之體之問題。伊川之學似止于在心之已發上言工夫，故其門下之蘇季

註 37. 同註 5，頁 194。

註 38. 同註 5，頁 201。

明、呂大臨，即感此中有一問題。而伊川之學則未足以答。【註39】

關於伊川之立場，以下二段文獻是重要線索：

大臨云：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

先生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二程全書·伊川文集卷五》）

又，

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

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二程全書·遺書第十八·伊川先生語四》）

由以上二段引文可知，伊川並未主張「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且伊川亦有其未發之工夫，此即涵養是也。果如此，則伊川所遺留之問題便不止是因為心為已發，以及未發無工夫所導致，而尚有其他種種可能。此義，可由牟宗三先生論伊川處得到進一步之說明。依牟先生：

伊川雖有如許之糾結顛倒，不明澈，然其實義自可見。而于糾結、顛倒、不明澈者，亦自有其確定而明澈者。此確定而明澈者為何？曰：

一、以其嚴肅之道德意識肯定一超越之實理是也；

二、「性即理」是也；

三、心是實然的心氣之心是也；

註 39. 同註 5，頁 202。

四、「中」只收縮于此實然的心就其不發未形而說是也；

五、「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後天漸教工夫是也。【註40】

果如此，則牟先生與唐先生之看法便有極大之出入矣，蓋依牟先生，則伊川無論在道體、性體、心體及工夫論，皆與明道不同，並非如唐先生所認為是一貫之發展也。此中之異同得失，則有待他日另文討論，本文既以唐先生之二程學為主，當可暫止于此矣。

六、結論

唐、牟二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的大師，雖皆屬新儒家，然而在學問上亦有其分歧之差異，本文即指出二先生在對二程理學之理解態度之差異，由是指出當代新儒家理論內部份充滿張力與發展之空間也。此中，我們首先由方法論說明唐、牟二先生之差別，由是而導致二人對二程思想之為同質或異質之討論，接著，便是因此而有的分系問題，當然，以上的結論更會影響二先生對朱子之定位，此則有待進一步之研究了。唯就唐先生而言，其完全貫徹其「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進路，充分說明明道對濂溪、橫渠之承繼與創新，同時也說明伊川對明道思想之補充，及其日後所遺留之問題。此中之大線索，則在濂溪橫渠乃是先由一客觀形上學之角度展開其學，此則不同明道之由主觀之識仁論其學也。同時，明道以其識仁、定性之說乃就主觀修養上用力，是以尤重其仁心無外，天人不二義之體認，是以此說亦處處消解二二對立之分解，而以一圓融之境示之，此即不同于濂溪橫渠之分解所顯之二二相對之相也。即至伊川，則就吾人雖可當下即是，然又畢竟有當下不即是之問題出發，重新審視吾人性與情間之不一，由是而更分辨性情，區別理氣，最後由心統性情，心貫理氣，以成其對明道學之補充。其次，則是伊川更就明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進一步展開，並由此二義以達合一之道。唯唐先生認為明道伊川之間乃是同質之發展引申，並無歧出之問題。然牟先生則堅持伊川為歧出，而與朱子為同路，由是形成當代新儒學大師對二程學理解之主要差別。至於此中進一步之比較，則留待日後更進一步的研究了。

註 40. 同註 1，頁 381。